

Y 887947

学校代码: 10200

研究生学号: 2053203006

分 类 号: G256

密 级: 无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语》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its spread in Han Dynasty

作者: 蒋焕芹

指导教师: 曹书杰 教授

学科专业: 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方向: 先秦文献

学位类型: 学历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06年5月

摘 要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它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文献。

先秦两汉时期，是《论语》的产生、定型、流传的重要阶段。本论文主要研究《论语》在汉代的发展历程，包括版本、传习者及后人对汉代《论语》注本的辑录情况等，其主要内容如下：一、结合出土文献，考证《论语》的资料来源、作者和成书时间，为下文考证汉代《论语》版本众多的情况打好基础。二、论述汉代《论语》的版本、传习者，并理清各版本的流传情况及《论语》版本合流的情况。三、搜集两汉《论语》注本的辑本，并进行著录。

关键词：论语；成书；两汉；版本；传习者；辑本

Abstract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corded the sayings and deeds of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As the major classic of Confucianism, it is the important literature to study Confucius and Confucian thoughts.

Before Han Dynasty,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d emerged, stereotyped and spread. This thesis concentrates on the growth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Han Dynasty. Include editions, learners and people compiled for the works of annotators. Main contents covered in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origin of its materials, Compilers and date of compilation. 2. Elucidate LU YU' S editions, learners in Han Dynasty. Ration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edition. 3. Record the compiled works of Annotated Analects of Confucius.

Key words: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mpilation; Han Dynasty; editions; learners; the compiled works of Annotated Analects of Confucius.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杨咏芹 日期：2006.5.29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杨咏芹 指导教师签名：
日 期：2006.5.29 日 期：2006.6.15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_____

电话：_____

通讯地址：_____

邮编：_____

引 言

儒教经典中，最尊者经也，经之最高者，《论语》也。“《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矜”，^[1]“孔子一生仕止久速、造次颠沛、纂修删述、盛德大业，靡一不具《论语》；及门弟子德性气质、学问造诣、浅深高下、进止得丧，靡一不具《论语》。”^[2]虽然《论语》仅万字有余，它却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文本。自《论语》问世以来，各种版本，包括集解、注疏、正义、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历来学者们对《论语》的成书意见不一致，对《论语》在汉代的版本、流传情况及对汉代佚注进行系统研究者寥寥无几，可谓学术上一大憾事。秦火及秦汉战乱之后，先秦文献典籍散失极为严重，《论语》抄本也曾一度失传。“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论语》的不同传本得以复出，并且出现了不同派别的《论语》研究者。汉代可谓《论语》学的开端。

从汉至今，《论语》的研究者络绎不绝。但是历代学者对《论语》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编纂者、成书年代、篇章次第与结构、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方面，虽然在研究《论语》和汉代学术史时，一般来说，会部分的涉及《论语》在汉代的流传情况，但由于大多非专门研究，故往往几笔带过，深究不足。近几年内，虽然出现了几部断代史性质的研究著作，但是数量较少，内容不全，有许多可补充之处。

汉代离《论语》的成书时代不远，这一时期，学者们耳闻目睹的有关《论语》的情况，最接近《论语》的原始面貌。对两汉时期《论语》的流传情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考察《论语》的源流，有追根溯源的价值，还能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论语》流传史这个历时系统。此外，对汉代《论语》流传的研究还具有共时的学术意义，即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汉代的学术面貌，政治、思想、文化及教育状况。

汉代《论语》注释之作已经非常可观，但是除了郑玄《论语注》有残卷出土外，其他全都散佚了，后世虽有部分辑佚，但是对汉代佚注辑佚情况进行著录者更是寥寥无几。故本论文将著录各家《论语》辑本情况，使人们了解汉代《论语》佚注辑佚之面貌，以供学者相关研究之参考。

[1] 《孟子注疏·孟子注疏题辞解》，第8页。

[2] 《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谭贞默语，第1083页。

第一章 《论语》的成书及名称问题

同先秦的其他古籍一样,《论语》的成书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清朝以来的疑古思潮也使学者们对《论语》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幸而,近年来,河北定州八角廊竹简《论语》、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竹简以及其他儒家文献的陆续问世,为我们研究《论语》的成书问题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材料。本文在历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论语》的内容、传世文献以及学者们对出土材料的研究,试对《论语》成书中的几个问题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节 《论语》应是集体的产物

历代学者都一致认为《论语》的成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如汉代学者刘歆言:“《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1]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也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2]赵岐《孟子题辞》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3]从“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弟子共纪”、“七十子之畴”这些字眼来看,《论语》一书,并非出自一两人之手,而是集体的产物。这个结论亦可以从《论语》文本本身得到印证。

从《论语》的称谓及体例来看,《论语》一书中,对孔子的称谓,多数篇章称“子”,也有的地方称“孔子”、“夫子”,在《子张篇》还有几章称“仲尼”。对于孔子弟子的称谓,更是不一致。有的只称字,如子路、子贡、子夏等;有的氏和字连称,如冉有、宰我、颜渊等;有的氏和名连称,如冉求、南宫适、宰予等;有的被尊称为子,如曾子、有子;而且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章节有不同的称呼方法,如冉有,亦被称为冉子、冉求,宰我时而称宰予。即使体例相同,亦有不同的称呼。如在叙述一件事时,有的称字,有的氏字连称,有的则是氏而不字。^[4]

在《论语》中,还有直接称名者,如《子罕篇》中,“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1] 《汉书·艺文志》,第1717页。

[2] 《论衡校释》,第1136页。

[3] 《孟子注疏》,第8页。

[4] 如《雍也篇》“子游为武城宰”,“子游”为称字;“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原思为氏字连称;“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冉子”为氏而不字。

《宪问篇》中，“宪问耻。子曰：‘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牢”是人名，相传姓琴，字子开；“宪”是原宪，字子思。整部书中只有这两处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相符，所以有人推断这两章是他二人自己的笔墨。

《论语》中这种宾主称谓的混乱，是由于集体编纂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每个人的身份和语言习惯的不同，对于具体称谓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就保持了原始材料的称谓。另一方面是由于《论语》的结集者们在整理资料、编撰成书时，为了保持材料的真实可靠性及书编成之后的权威性，只是直录了原来的资料，并未对称谓做统一的规定。

《论语》中这种称谓和体例的不同，看似驳杂，其实正是由于不同的篇章成于不同人之手，而且成书有个较长的过程造成的。从出土材料来看，《论语》中孔子称谓的差异，有些可能是在传抄中形成的。1973年，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论语》、《文子》、《太公》等竹简，被认为是《论语》的汉简有620枚，录成释文共7576字，不足今本的二分之一。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故竹简的抄写当在此时之前。^[1]用简本与今本作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孔子称谓上常常互有差别。虽然这些可能是抄写的错误，但是如果《论语》一书本身称谓完全一致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再次，《论语》中出现了很多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先是见于《学而篇》，后又见于《阳货篇》。又有基本上重复但详略不同的章节，如：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

亦有意思相同而文字略异的章节，如：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

这两章的意思基本相同，只不过孔子对樊迟的回答要简略于对哀公的回答。《论语》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不同的作者对话语的理解存在着歧义，或者孔子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相似的话，在编纂成书时，为了保持话语的真实性，孔门弟子只好照录原文。我们还要注意，《论语》的内容除了以“子曰”形式出现的以外，还常有孔子与

[1]参见《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和《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

弟子的问答，共涉及弟子有名姓者三十多人；此外还有孔子弟子单独说的话，如“曾子曰……”、“有子曰……”，从这个方面来看，《论语》显然是集体的成果。

儒家著作《孟子》、《荀子》都曾征引孔子的言论，这些言论亦有不少见于《论语》。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孟子》引《论语》”条指出：“《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1]此外，《孟子》中所记载的孔门言行及所述“仲尼之意”，在今本《论语》中可以得到印证的还有十条。^[2]而《荀子》对《论语》的内容也多有阐述和发挥。^[3]虽然两书在引文上与今本《论语》有出入，但其与今本《论语》所记载的孔子的思想、行事是完全符合的。我们知道，孔子死后，儒学分化，《韩非子·显学篇》就曾谈到此问题：“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4]孟子的“孟氏之儒”和荀子的“孙氏之儒”虽属不同的派别，但二人都承认《论语》的地位。如果《论语》是出于某人之手，而不是由集体编纂，它何以能得到这种普遍的认可呢？

第二节 《论语》资料的来源及作者问题

《论语》一书既然是集体的产物，并非出自一人之手，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是谁人呢？其成书的过程是怎样的呢？资料从何而来呢？

《汉书·艺文志》言“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这一说法得到了今人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此言《论语》的资料来源于孔子弟子的记录，成书于孔子的门人。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两汉时期，“弟子”与“门人”的含义并不相同。“弟子”指孔子的“亲授业者”，而门人则指授业于孔子弟子者。《汉志》的这种说法大致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论语》的内容记到孔子的弟子为止。

《论语》的成书应当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论语》的成书自孔子出言教诲弟子至最后的书写成稿，其过程漫长复杂，非仅探究某一弟子或某一门派即可毕其功。若欲详言之，在此过程中的听闻者、口传者、记录者、集稿者、编纂者与最后的定稿者，都代表着不同的传承阶段，而每一阶段可能有不同人或多人参与其中。”^[5]《论语》最初的资料来源于孔子弟子的记录和记忆。或许在孔子死后孔子弟子已经开始了对孔子言语进行辑录，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

[1]《日知录集释》，第583页。

[2]参见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孔子研究》1987年3期，第94—96页。

[3]参见杨树达《论语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4]《韩非子集释》，第1080页。

[5]蔡彦仁《从宗教历史学看口述〈论语〉的传承与特征》，《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第42页。

弟子恐离居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1]但是从《论语》的情况来看，孔子弟子并未进行《论语》的编纂成稿，《论语》的最后撰集则由孔子的再传弟子来完成。正如钱穆先生在《论语要略》中所说：“大抵《论语》所记，自应有一部分为孔子弟子当时亲手所记录者，而全书之纂辑增订，则出于七十子之门人耳。”^[2]

《论语》最初的资料来源于孔子弟子，这在《论语》文本本身就可以找到线索：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子张在听到孔子的谆谆教导后，唯恐忘记，于是就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孔子弟子确实有记录孔子教诲之言的习惯，这就形成了日后孔门弟子结集《论语》一书的基础。

在《论语》一书中有明显的孔子弟子闻之于孔子而又对他人或者其弟子讲述的话。如《论语·子张篇》无一章记孔子直接说的话，皆孔子弟子之言与事，或弟子闻于孔子之言。如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这些话既然是曾子说的闻诸于孔子的话，且称曾子为“子”，显然在编纂时出自孔子的再传弟子之手，大多数学者认为凡是“曾子曰”处当为曾子弟子所记。

其次，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3]又可以证明弟子各有所记。就现存的先秦古籍来看，最多的只有几十篇，就当时书写于竹简的情况而言，一部书不可能容纳数百篇。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因而当时一定存在大量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与口传，其中只有一部分经过商榷认可之后录入了《论语》，其他孔子言行仍然在社会上流传。西汉学者刘向也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4]

《论语》流传至汉代，出现了不同的传本，如《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论语》在编定之初，当无版本之别，汉代《论语》传本不同，应该是口传不同之故。《汉书·艺文志》除列《论语》各种传本外，又列“《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这些亦是有关孔子言行的记录。由于孔子的学生众多，而且他们与孔子的交流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的，因而发生“弟子各有所记”的情况是很自然的，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孔门弟子三千人，即算那登堂入室的七十二

[1]《经典释文》，第59页。

[2]《论语要略》，第3页。

[3]《论衡校释》，第1136页。

[4]何晏《论语集解序》引，见《论语注疏》第2页。

子，他们该有七十二种不同的《论语》。”^[1]“我则认为，《论语》在先秦时期不但存在，而且存在若干种。《论语》本来就是孔子弟子的笔记本，也就是说，《论语》的原始形态是许多种笔记本子，或者说是许多种不同的书，而不是一部书，也不是一部书有许多不同的版本。”^[2]《论语》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专记孔子与其弟子或他人的问答情况。第二类记孔子的弟子与他人之间的问答情况。第三类，由孔子后学对孔子的描述性记载。实际上，孔子的言行除了弟子的听讲笔记外，还有口传的资料，孔子弟子在教授弟子时，引用孔子的话，追述孔子的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些话又被孔子的再传弟子追记。这些口传的资料也是《论语》的资料来源。

对于《论语》的作者，汉代学者多有论述。如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3]王充《论衡·正说篇》云：“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4]赵岐《孟子题辞》云：“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5]此三者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的。我们知道，孔子的著名弟子如子路、颜回、宰予等人都比孔子早死，因此，他们是不可能参与《论语》的编纂的。汉代学者还有人认为《论语》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编纂。如《经典释文·序录》引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6]同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7]汉代以后亦有人言之，宋均注《论语崇爵谥》：“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8]《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9]这种看法与前面虽稍有不同，但在肯定《论语》是由孔门弟子编纂方面是相同的，不过从今本《论语》来看，《论语》成书于孔子弟子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论语》最初的资料虽然来源于孔子的直系弟子，但其最后的编定者应该是孔子的再传弟子。第一，《汉志》所说的“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已明确地将《论语》的记录者孔子弟子和结集者孔子门人区分开来。第二，《论语》除了称孔子为“子”外，还将孔子的某些弟子称为“子”，这些不可能是孔子弟子之间相互的称呼，应该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对直传弟子的称呼。孔子弟子被称为“子”的，有曾子、有子、冉子、闵子等。称“曾子”的章节有：

[1]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153页。

[2] 郭沂《再论原本〈论语〉及其在西汉以前的流传》，《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第38页。

[3] 何晏《论语集解序》引，见《论语注疏》第2页。

[4] 《论衡校释》，第1136页。

[5] 《孟子注疏》，第8页。

[6] 《经典释文》，第59页。

[7] 《经典释文》，第1348页。

[8] 《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三册，第2278页下。

[9] 《文选》，第748页下。

1、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2、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以上见于《学而篇》）

3、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

4、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5、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6、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7、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8、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以上见于《泰伯篇》）

9、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

10、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篇》）

11、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12、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13、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14、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以上见于《子张篇》）

称“有子”的章节有：

1、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篇》）

称“冉子”的章节有：

1、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雍也篇》）

2、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子路篇》）

称“闵子”的有一章：

闵子侍侧，阊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篇》）

邢昺曰：“子者，古人称师曰子……经传凡敌者相谓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称师亦曰子。”^[1]从《论语》的情况来看，显然其称“子”乃是弟子对老师的尊称，这些章节，不可能出于孔子直系弟子之手，只能是再传弟子对其师的记载。

第三，“夫子”一词在《论语》中的意思也不一致。“夫子”一词在战国以前一般用来称呼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用于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此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中一般用法属于前者，孔子弟子只有在背后才称孔子为“夫子”，当面则称“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后称“夫子”。但在《先进篇》“侍坐”一章，曾皙问孔子“夫子何哂由也”（定县竹简《论语》作“吾子”），当面称孔子为“夫子”；《阳货篇》也有两处当面称呼孔子为“夫子”，“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昔者由也闻诸夫子”。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对人言及孔子称“夫子”处，是孔子弟子的记录，而在成书时再传弟子直录，当面称孔子为“夫子”处是孔子再传弟子的记载。

第四，《论语》载有曾子之死（见于《泰伯篇》）。曾子为孔子晚年弟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几乎为孔子最年轻的弟子，且活到七十一岁，曾子去世时，孔子弟子已所剩无几，而且《论语·子张篇》中还有有关曾子弟子的记载：“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阳肤为曾子弟子。^[2]

《论语》成书于孔子再传弟子之手，对于这个问题，唐代柳宗元^[3]已经开始探讨。他在《论语辨》中直接以经文为证，即《论语》中有曾子临死前与门弟子的对话（见《泰伯篇》），认为“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3]“或谓：

[1] 《论语注疏》卷一，第2页。

[2] 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见《论语注疏》卷十九，第280页。

[3] 《柳河东集》卷四《论语辨》，第110页。

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1]认为《论语》的作者为曾子弟子。宋代的程颐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上有子弟子，认为“《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2]沿着这条称谓不同的线索，宋永亨认为：“《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高弟亦曰回，亦曰雍，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指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予意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则可见矣。”^[3]元代何异孙在《十一经问对》中称：“《论语》一书，窃意曾子弟子为之。”^[4]以上各家皆言《论语》编纂者仅为某某之弟子，虽然各有所据，但又可以相互说明彼此的不全面性，笔者上文所述亦能证明他们皆有不合理之处。近年来，有人根据《论语》记曾子言论多，再检校孔子不同科类的弟子和先秦以师称“子”两条线索，认为，《论语》主要出自曾氏之门，或者说曾子及其弟子是编纂、传播《论语》的核心。它有孔门弟子相与辑而论纂、特别是曾子传授的基础，它起于曾子，终于子思。它经历了从孔子歿后(公元前479年)至曾子去世不久(公元前436年之后)约半个多世纪的酝酿传承、汰选洗练的过程，最终由子思补缀结集完成。《孝经》、《大学》以及大小戴《礼记》中的有关曾子篇什，成书轨迹与此相类。统称曾子为领衔主编(领纂)，符合先秦诸子的著述习惯。^[5]还有人认为《论语》有一定的思想主旨，有内在的严密逻辑，有“正实而切事”的突出特征。该书材料来自孔门众多弟子，而由子思具体纂辑完成”。^[6]

对于《论语》的成书，我们并不能否认个别弟子所起的作用。《论语》的编纂是一个极其重要、庞大的工程，涉及到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收集整理、回忆记录，以及对众多材料的辨别、选择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这样一项活动自然要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者，要设立几位总编式的人物，这些组织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显然要大于其他弟子，他们是《论语》的实际编纂者；而能成为组织领导者的，自然是孔门弟子中已经立派或影响较大的人物。”^[7]例如曾子，他是孔门中颇有影响人物，《论语》中对他的称呼无一处不称“子”。《论语》的内容，有一类属于孔子的弟子与他人之间的问答情况，其中以记载曾子的言行居多，可见，曾子弟子在《论语》的编纂中起过领导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论语》是由某一门派或某一人编纂的。因为孔子弟子来源广泛，并不限于鲁国，如端木赐，卫人；颛孙师，陈人；公冶长，齐人。而且孔子死后，弟子分散离居，分化

[1]《柳河东集》卷四《论语辨》，第110—111页。

[2]朱熹《论语序说》引程子语，见《四书集注》第68页。

[3]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见《经义考》第1083页。

[4]同上。

[5]参见贾庆超《曾子领纂〈论语〉说》，《东岳论丛》2003年第一期，第87—88页、129页。

[6]参见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第32—39页。

[7]梁涛《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为不同的派别。如《汉书·儒林传》所云：“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1]《论语》涉及众多弟子，其丰富的内容并不是某一人可以毕其功的（前已论及《论语》为集体的产物）。

既然孔子死后，儒学就已经开始分化，各派之间还时而相互攻讦，到其再传弟子时，有可能一起编纂此书吗？其实这是完全可能的，或者说正是由于儒学的分化，才有了《论语》编纂的需要。我们知道，孔子一向主张“述而不作”，他只是把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与思索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而不转借于文字之繁。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又注意“因材施教”，对同一个问题针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回答，而且，孔子的思想本来就博大精深，这必然会使弟子的认识产生分歧。随着孔子去世，这种分歧不断加剧，并演变为彼此间的争论，这就促使门人通过“相与辑而论撰”，编纂一部各派都认可的著作，以结集的形式确立孔子的基本思想。

第三节 《论语》成书的时间问题

《论语》成书的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汉唐学者一般只说孔子死后，并未言明具体时间，唐以后历代学者对《论语》的成书时间多有研究，但也不出汉代学者的框架。至清代，疑古思潮兴起，人们对《论语》的成书产生了怀疑，认为《论语》一书“不纯”。其中以崔述的研究为代表，他根据《论语》前后十篇在体例和称谓上存在的差异，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2]“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3]崔述的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要观点，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有的学者还一一落实各篇写书的时间。^[4]

《论语》中记有曾子临终之言，其编定应该在曾子死后。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间的上限。然而我们推算《论语》编定时间的上限，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孟敬子的卒年。《泰伯篇》有“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一章，孟敬子是鲁大夫仲孙捷，“敬”是谥号，所以《论语》编定时间的上限应该在孟敬子的卒

[1] 《汉书》，第3591页。

[2] 《崔东壁遗书·论语余说》，第616页上。

[3] 《崔东壁遗书·论语余说》，第616页下。

[4] 如：胡志魁《论语辩证》，台北经联出版实业公司1975年版；朱维铮《〈论语〉结集辨说》，《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美）H.G.Creel著、高专诚译《孔子与中国之道——现代欧美人士看孔子》之附录《论语的确实性》；程刚《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载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

年。孟敬子的卒年已经不可考，但是《礼记·檀弓》有一章“悼公之丧，季昭子问于孟敬子曰：‘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达礼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闻矣，勉而为瘠，则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则食食。’”^[1]据《史记·六国年表》和《鲁世家》，悼公死于公元前429年，那么孟敬子之死还在其后。所以我们把《论语》编定时间的上限定于公元前429年。但是，《论语》成书时间的下限又该如何确定呢？

我们从《论语》一书的内容来看，其所记言行到孔子弟子为止，且涉及到一个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以他的出现时间不可能太晚，否则连其他有名的孔门弟子如子思的言语也录进去了。

近几年来，出土文献的日益丰富，为我们研究《论语》的成书时间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礼记·坊记》：

《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中庸》、《表記》、《坊记》、《缙衣》，皆取《子思子》。”^[3]《子思子》一书，《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说明其书至少隋唐时尚存，宋以后方佚。陈梦家先生指出：马总《意林》引《子思子》见于《表記》、《缙衣》者各一条，《太平御览》四〇三引《子思子》见于《表記》者一条，《史记·平津侯列传》索隐引《子思子》见于《中庸》者一条，《后汉书·朱穆传》注引《子思子》见于《中庸》者一条，《文选》卷五十一王子渊《四书讲德论》注引《子思子》见于《缙衣》者一条。^[4]可见沈约所说应是有根据的。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后人的怀疑。不过，郭店楚墓竹简及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均有《缙衣》一篇，两者内容相同，且与今本内容也基本相同。根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5]上博简的年代与此相差不远，证明《缙衣》确实是先秦古籍。学者们通过研究，认为《缙衣》确实出于《子思子》，^[6]沈约说《缙衣》、《坊记》等篇取自《子思子》应是可靠的。楚简《缙衣》中有的篇章可以在《论语》中找到影子。如《论语·为政》说：“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楚简《缙衣》则说：“子曰：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欢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

[1]《礼记正义》卷九，第279页。

[2]《礼记正义》卷五十一，第1408页。

[3]《隋书》，第228页。

[4]《尚书通论》，第29页。

[5]见湖北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47页。

[6]参见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有祐心。故慈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缙衣》这一段“子曰”显然是从《论语》“道之以政”一章演变而成，或者是对《论语》相应章节的修饰增添的结果。可以肯定，《缙衣》应在《论语》之后产生。所以我们就把《论语》成书的下限定在子思的卒年。而子思大约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根据这种推断，《论语》当结集于公元前429年至公元前402年这27年之间。而且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编定者当仅限于孔子再传弟子。

总之，正如佛教典籍的结集与产生一样，《论语》的成书经历了由口诵到写本的过程。在孔子歿后，孔子弟子已经开始对其言行进行结集，但是当时并未编定成书，至孔子再传弟子时，他们再次结集，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进行收集整理，讨论辨别，经过大家的一致认同，选择“正实而切事者”编定成书。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同先秦时代的任何一部书一样，《论语》在流传的过程中会有脱简增字现象的出现，这在汉代流传的《论语》不同版本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论语》的价值。

第四节 《论语》在汉代的名称问题

两汉时期，《论语》一书的称谓比较多。或单称《论》，或单称《语》，有时候也被称为《记》或《传》，或称《论语》。称《论》者如：

且《论》已见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1]（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篇》）

刘向《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2]（皇侃《论语义疏序》引）

唯长安侯祐质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诗》、《论》，笃学乐古，仁惠爱下。^[3]
（《后汉书·孝安帝纪》）

称“记”的如：

《语》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4]（桓宽《盐铁论·通有篇》）

《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斯近之矣。”^[5]（《后汉书·邳彤传》）

《语》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6]（《后汉书·桥玄传》）

[1] 《春秋繁露义证》，第255页。

[2] 《论语集解义疏》，第3页。

[3] 《后汉书》，第204页。

[4] 《盐铁论》，第15页。

[5] 《后汉书》，第759页。

[6] 《后汉书》，第1698页。

汉人在引用《论语》原文时，称《传》的也很多，如：

《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1]（《史记·封禅书》）

《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2]（《史记·滑稽列传》）

《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汉书·宣帝纪》）

《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4]（《后汉书·孝安帝纪》）

《论语》何时被称为《传》呢？为何被称为《传》呢？《汉书·刘歆传》曰：

至孝文皇帝始使晁错从伏生受《尚书》，《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5]

赵岐《孟子题辞》说：

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6]

孔颖达说：

凡书，非经则谓之“传”，言“及传《论语》、《孝经》”，正谓《论语》、《孝经》是“传”也。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太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赐翟方进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也。以《论语》、《孝经》非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故谓之传，所以异于先王之书也。^[7]

可见，《论语》在汉文帝时出现，因其不是先王之书而被称为“传”，又因被立过传记博士，所以“传”之名称用的非常广泛。有时候被称为“记”，如《后汉书·赵咨传》：“《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8]

但是“传”、“记”只是人们对《论语》的一个称呼，并不是《论语》的又一别名和

[1] 《史记》，第1355页。

[2] 《史记》，第3208页。

[3] 《汉书》，第250页。

[4] 《后汉书》，第217页。

[5] 《汉书》，第1968—1969页。

[6] 《孟子注疏》，第9页。

[7] 《尚书正义》，第14页。

[8] 《后汉书》，第1315页。

专称，而是一类文献的总称。汉世属于传记的书并非只有《论语》，其它诸子著作亦被称为“传”，它只是传记中非常重要一部书。如《汉书·东方朔传》：

《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1]

东方朔所引“传”的文字，见于《荀子·天论》和《荣辱》。刘向《孙卿书录》说《荀子》“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这是明确地将《荀子》纳入传记的范围。《孟子》与《论语》同置传记博士，也被当作六经的传记看待，如《汉书·景十三王传》云：“（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2]这里的《周官》、《尚书》、《礼》属于经，而《礼记》、《孟子》等则显然属于传记。

《论语》一名在汉人著作中也常常出现，且在汉初的一些著作之中，已经出现。如韩婴的《韩诗外传》：

《论语》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3]（《韩诗外传》卷二）

《论语》曰：“必也正名乎！”^[4]（《韩诗外传》卷五）

《论语》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5]（《韩诗外传》卷六）

董仲舒在其对策中也曾使用《论语》之名：“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6]

关于《论语》一名出现的时间，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7]似乎《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起的。这一说法与班固的说法不同，班固认为，“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8]肯定《论语》编纂成书时就命名的。而且班固还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古二十一篇”。班固与王充为同时人，且班氏《汉志》本于刘向《别录》，由班氏著录来看，《论语》当在编定之时就已经命名了。王氏之说未必与事实相符。刘宝楠批评王充说：“扶卿为《鲁论》之学，见《汉艺文志》，不传《古论》，……

[1]《汉书》，第2866页。

[2]《汉书》，第2410页。

[3]《韩诗外传集释》，第57页。

[4]《韩诗外传集释》，第201页。

[5]《韩诗外传集释》，第209页。

[6]《汉书》，第2495页。

[7]《论衡校释》，第1138页。

[8]《汉书》，第1717页。

《论衡》此言，未知何本。至《论语》之名早见《坊记》，岂至安国及扶卿时始有其名。王充于经术颇疏，此等说，终是不可据也。”^[1]

汉文帝时，已经为《论语》置博士，如果当时《论语》尚无名称，怎置博士？且在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论语》之名。《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也见《论语》之名：

曾点，曾参父，字子，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论语》所谓浴乎沂，风平舞雩之下。^[2]

孔安国还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说《孔子家语》：“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从孔安国之言来看，《论语》在当时就有名字了，并不是他给加上的。^[3]

[1] 《论语正义》卷二十四，第126页。

[2] 《孔子家语注释》，第400页。

[3] 《孔子家语注释》，第525页。

第二章 西汉时期《论语》的流变

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云：“《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虽同时并罢（博士），其罢之之意则不同。《孟子》以其为诸子而罢之也，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然则汉时《论语》、《孝经》之传，实广于五经，不以博士之废置为盛衰也。”^[1]王氏此言，足以概括《论语》在西汉时的流传情况。^[2]刘歆撰《七略》，列《论语》于《六艺略》之中，六经之后即为《论语》，可见，《论语》在西汉的地位，仅次于六经。本章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并结合出土文献，对《论语》在西汉的流传及演变情况作简单概述。

第一节 西汉《论语》传本考略

经历了秦火和秦汉之际的动荡、战乱之后，先秦的文献典籍散失极为严重，《论语》的抄本也曾一度失传，“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所以，在汉代《论语》复出现若干传本。

一、文献记载之《论语》传本

（一）《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

《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议奏》十八篇。石渠论。《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

[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第178—182页。

[2] 《论语》在汉代的诵习情况可参见：①王国维《汉魏博士考》，②田春来《汉代〈论语〉的流传与演变》，中国优秀硕博论文2005。

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1]根据《汉志》的记载，《论语》传本为学者们一致认可的有三个本子，即《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皇侃《论语义疏序》引刘向《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可见，在汉代，三种《论语》的来源是不同的。

1. 《古论语》21篇

在汉代至唐代的文献之中，除《汉志》之外，有关《古论语》的记载非常多。桓谭《新论》云《古论语》与《齐论语》、《鲁论语》“文异者四百余字”。^[2]王充《论衡·正说篇》云：“夫《论语》……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3]何晏《论语集解序》曰：“鲁恭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4]如淳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5]皇侃《论语义疏序》云：“《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为孔安国所注，无其传学者。”^[6]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两《子张》。孔安国为传，后汉马融亦注之。”^[7]《隋书·经籍志》：“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8]

由文献记载可知，《古论语》共有二十一篇，是鲁恭王坏孔子宅时从孔壁中发现的。鲁恭王坏孔子宅的时间，据《汉志》记载：“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9]但是，有关鲁恭王坏孔子宅的时间，《论衡》中的记载却有两种。《佚文篇》言：“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闻弦歌之声，惧，

[1] 《汉书》，第1716—1717页。

[2] 《经典释文·序录》，第60页。

[3] 《论衡校释》，第1136页。

[4] 《论语注疏》，第4—5页。

[5] 《经典释文·序录》，第60页。

[6] 《论语集解义疏》，第3—4页。

[7] 《经典释文》，第60—61页。

[8] 《隋书》，第939页。

[9] 《汉书》，第1706页。

复封涂，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1]《案书篇》言“孝武皇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2]这和《汉志》的说法基本相同。而《正说篇》却说此事发生在汉景帝时，“至孝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3]那么鲁恭王坏孔子宅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二十八年薨，不得至武帝末。《论衡》以为孝景时，是也。”^[4]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也认为是在孝景帝时。^[5]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鲁恭王的生平。《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二十八年薨……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6]鲁恭王于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5年）被立为王，在位28年薨，这时候是汉武帝元朔元年，即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在公元前140年即位，在位共54年，可见鲁恭王在汉武帝即位初年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坏孔子宅得《古论语》的时间不可能是武帝末。而鲁恭王又是于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并不是汉武帝时才被封在鲁地的，且为王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所以坏孔子宅的时间应当是景帝末。那么，《古论语》的发现时间是在景帝末了。

2. 《齐论语》22篇

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文献中，有关《齐论语》的记载也屡见不鲜。何晏《论语集解序》云：“《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7]《论语集解义疏序》：“《齐论》题目与《鲁论》大体不殊，而长有《问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为琅邪王卿等所学。”^[8]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并传之，唯王阳名家。”^[9]《隋书·经籍志》：“《论语》者，……汉初，有齐、鲁之说。齐人传者二

[1] 《论衡校释》，第860—861页。

[2] 《论衡校释》，第1161页。

[3] 《论衡校释》，第1125页。

[4] 《汉书补注》，第3097页。

[5] 《尚书古文疏证》，第36页。

[6] 《汉书》，第2413—2414页。

[7] 《论语注疏》，第3—4页。

[8] 《论语集解义疏》，第4页。

[9] 《经典释文》，第60页。

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齐则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1]从文献记载来看，《齐论语》22篇，是齐人所传，流行于齐地的一个《论语》的本子，这也是其命名为《齐论语》的原因。而《齐论》出现的时间，历史上缺乏明确记载，《汉志》言“汉兴”，且记载了其传者为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何晏等人又增王卿。王吉生活于武、昭、宣、元时期，少明经学。宋畸曾在汉宣帝时任少府、左冯翊等职，贡禹生活于武、昭、宣、元时期，五鹿充宗曾生活于昭、宣、元时期，庸生盖为宣、元时人，王卿在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自杀，^[2]从这些传习者的生活时间来看，《齐论语》的出现时间不会晚于汉武帝时期。

3. 《鲁论语》20篇

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文献中，有关《鲁论语》的记载也很多。《论语集解序》：“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3]《论语集解义疏序》：“《鲁论》有二十篇，即今日所讲者是也。……《鲁论》为太子太傅夏侯胜及前将军萧望之、少府夏侯建等所学。”^[4]《经典释文·序录》：“《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及子玄成、鲁扶卿（郑云‘扶先’，或说，先，‘先生’）、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将军萧望之并传之，各自名家。”^[5]《隋书·经籍志》：“鲁人传者二十篇。……《鲁》则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韦丞相节侯父子、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并名其学。”^[6]可见，《鲁论语》二十篇，是流传于鲁地，鲁人所学所传的一个本子，故被命名为《鲁论语》。《鲁论语》和《齐论语》一样，出现的时间在历代文献中没有记载，其传者有龚奋、夏侯胜、韦贤及子韦玄成、鲁扶卿、夏侯建、萧望之等人。龚奋无考；夏侯胜曾生活于武、昭、宣时期；韦贤于武帝时被征为博士，号称邹鲁大儒，卒于宣帝时；萧望之在宣帝时曾为太子太傅；这些人生活的鼎盛时期大都在宣、元时期，韦贤生于公元前141年，其在武帝初期或许已经开始传授《鲁论语》，那么《鲁论语》的出现时间，应该也不会晚于汉武帝时期。

《齐论》、《鲁论》的传习者，最早是汉武帝时人，据此，有的学者认为二者的出现在《古论》之后。如郭沂认为《齐论》、《鲁论》的出现时间晚于《古论》，具体地说，

[1]《隋书》，第939页。

[2]《汉书·百官公卿表》：“天汉元年（前100）济南太守琅邪王卿为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杀。”然《武帝纪》所云与此稍有出入，“（天汉）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

[3]《论语注疏》，第2页。

[4]《论语集解义疏》，第4页。

[5]《经典释文》，第60页。

[6]《隋书》，第939页。

在宣帝年间。^[1]陈东也认为《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2]但是笔者认为此说不能成为定论。《论语》在汉代初期并非没有流传。汉初叔孙通为汉高祖定礼仪，引“夏因周礼所损益可知”。^[3]陆贾《新语》也屡引《论语》，如《道基》：“磨而不磷，涅而不淄。”（见《论语·阳货篇》）^[4]《辨惑》：“昔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见《论语·颜渊篇》）^[5]贾谊为文帝时博士，在其著作中也常引《论语》，如《新书》卷六引《雍也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汉文帝时为博士的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景帝时为博士的董仲舒在其对策及《春秋繁露》中引《论语》之文也非常多。叔孙通为鲁人，陆贾是楚人，贾谊是洛阳人，韩婴是燕人，董仲舒是齐人，可见，《论语》在汉初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如果说，《齐》、《鲁》二《论》在《古论语》出现之前没有流传，那是不可能的。

4. 三《论》的异同

《齐论》和《鲁论》是用汉代的隶书写成的，是今文本，《古论》发现于孔壁，是古文本，三者除了今古文的不同之外，还存在很多差异。

从篇数上看，《汉志》著录：“《论语》古二十一篇。”班固自注“出孔子壁中，两《子张》”。而如淳却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7]何晏在《论语集解序》中云《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8]皇侃《论语义疏序》：“《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9]《隋志》云《古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10]《汉志》又录“《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多《问王》、《知道》。”^[11]何晏云：“《齐论语》二十二篇……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12]皇侃《论语义疏序》说“《齐论》题目与《鲁论》大体不殊，而长有《问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13]如淳说《问王》、《知道》都是篇

[1] 郭沂《〈论语〉源流再考察》，《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第34—35页。

[2] 陈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第6—7页。

[3] 《汉书·叔孙通传》，第2126页。

[4] 《新语校注》，第24页。

[5] 《新语校注》，第73页。

[6] 《新书校注》，第230页。

[7] 《汉书》，第1716页。

[8] 《论语注疏》，第4页。

[9] 《论语集解义疏》，第3—4页。

[10] 《隋书》，第939页。

[11] 《汉书》，第1716页。

[12] 《论语注疏》，第3—4页。

[13] 《论语集解义疏》，第4页。

名。《汉志》录“《鲁》二十篇”。

从篇次上看，何晏云《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1]《经典释文》亦云如此。皇侃云《古论》“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堯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2]《汉书·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3]《鲁论》与《齐论》以及同一派中不同的传者所用的本子篇次亦有不同。可见，《论语》在西汉时的篇次是不固定的。

从章句上看，对于“子曰不知命”一章，《经典释文》注明“《鲁论》无此章，今从古。”^[4]《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有“不知命”一章，但是此章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以两行小字连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段，可见此章在各种《论语》中的有无情况是不同的。何晏云：“《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5]《隋志》云《古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6]

从行文上看，桓谭在《新论》中以为《古论》与《齐论》、《鲁论》“文异者四百余字”。皇侃云《齐论》与《鲁论》“篇内亦微有异”。

综合这些记载，三种本子的大体情况是：

第一、《鲁论》与《古论》的内容差不多，只是篇次不同，文字稍有出入。

第二、《齐论》比《古论》和《鲁论》多《问王》、《知道》两篇，其余二十篇中章句多于《古论》和《鲁论》。

第三、《古论》、《鲁论》、《齐论》的篇次不相同。

对于三《论》的差别，皇侃《论语义疏序》认为：“寻当昔撰录之时，岂有三本之别，将是编简缺落，口传不同耳。”^[7]皇侃的说法非常有道理。三《论》的存在，并不是说《论语》编撰成书之后就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而是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有了差别。

（二）三《论》之外的《论语》传本

除了《三论》之外，汉代《论语》还有其它本子。

《汉志》在《论语》类中亦列“《传》十九篇”，颜师古注曰：“解释《论语》意者。”历来《传》十九篇都被看作是解释《鲁论语》的书。但是，在《汉志》中解释《论语》

[1]《论语注疏》，第4页。

[2]《论语集解义疏》，第4页。

[3]《汉书》，第3347页。

[4]《经典释文·论语音义》，第1391页。

[5]《论语注疏》，第3页。

[6]《隋书》，第939页。

[7]《论语集解义疏》，第4页。

的书，除此之外皆称“说”，如《齐说》二十九篇是解释《齐论》者；《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都是解释《鲁论》者。它们不单称“说”，且于前面冠以“齐”或“鲁”，说明为何种传本之说。可见颜师古的说法并不一定是对的。汉儒对于古书的分类，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且最重六经；其次名为“记”或“传”，乃解释或补助诸经者，《论语》即属于此类。既然“传”和“经”是相对的，“传”是西汉儒家学者解经的著作形式，《论语》属于传记类的文献，所以解释它的书不可能称为“传”。而且《论语》之名，在汉代称谓并不一致，“传”乃其称谓之一。如《史记·封禅书》：“《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见《论语·阳货》）^[1]《法言·孝至》：“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见《论语·季氏》）^[2]那么，《传》十九篇应该是《论语》在汉代的一个本子。

《汉志》亦载“《燕传说》三卷”，“《议奏》十八篇”。《燕传说》，从其书名来看，汉代在燕地应该也有《论语》本子的流传，即《燕论语》，而《燕传说》则是解释《燕论语》者。“《议奏》十八篇”，所谓《议奏》即是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年）召集诸儒在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的汇集，此次论定五经“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这时候《论语》也应该有了一个论定本，但其面目如何，是否曾经在学者中间流传，无资料可考。唯知《论语》传习者参加石渠阁会议的只有韦玄成和萧望之，他们都是《鲁论》传习者。当时黄门郎梁丘临奏使问诸儒，萧望之条奏其议，可考见者，唯此三人。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云：“按，《韦玄成传》：‘玄成与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考五经诸儒中唯琅邪王吉兼通《齐论》，意此议奏当有王吉一家在内，而《齐论·问王》、《知道》二篇，当日所以去留之故，亦必在此十八篇中，惜无由考见也。”^[3]

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谈到《论语》的流传情况时说：“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4]“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5]依王充所言，还有《河间论语》的存在。翟灏《四书考异》论之曰：“《河间论语》，不惟《汉志》不载，诸儒皆绝口不言。据云《古文》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当时《齐论》已多于《古》二篇，则《河间论语》当有七篇。《汉志·论语》十二家，有《燕传说》三卷。《燕传》犹言《燕论语》，疑即《河间论语》。河间故赵地，逼近于燕，或河间献

[1] 《史记》，第1355页。

[2] 《法言注》，第348页。

[3] 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1569页下—1570页上。

[4] 《论衡校释》，第1136页。

[5] 《论衡校释》，第1139页。

王得自燕境，因一称《燕传》欤？”翟氏所说亦是存疑，不足为据。王充的记载也让人迷惑不解。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1]河间献王所得民间藏书中，有《论语》的存在是非常可能的。《汉志》对文献的记载，并不全面，王充所言，当有根据。只是《河间论语》早佚，已经不可考见了。

具有明确记载汉代所见《论语》的本子，还有东汉赵岐提到的《论语》。他在《孟子题辞》中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2]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3]而且《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4]可见，赵岐言文帝置《论语》博士应该是可信的。只是由于时代较早，此本《论语》也早不可考。

二、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出土《论语》的问题。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定州八角廊村40号西汉墓中发现了大量竹简，其中属于《论语》的汉简有620枚，录成释文的共7576字，不足今本的二分之一，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说：“这部《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是时有《鲁论》、《齐论》、《古论》的存在。它的特异之处，是研究《论语》的新材料。”^[5]“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的文字，差异很多，其中有的是抄写者脱漏、抄错或简写的字，有的则是按底本上写的字。属于底本上文字的不同，不仅反映有无差误，也应当能够反映出它是哪种《论语》，所以可供学者深入研究。”^[6]但是此《论语》到底为何种传本至今尚无定论。李学勤先生认为“竹简不会是《鲁论》系统的本子，考虑到《古论》流传不广，《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些”。^[7]孙

[1]《汉书》，第2410页。

[2]《孟子注疏》，第9页。

[3]《汉书·刘歆传》，第1968—1969页。

[4]《史记》第2491页。

[5]《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第1页。

[6]《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第2页。

[7]李学勤《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学小议》，见《简帛研究》第257页。

钦善先生说“此本保留了古文《论语》的一些面貌”，^[1]这两种说法皆无系统论证。王素先生在分析了两汉时期学术上由齐转鲁的风气以及简本《论语》与《张侯论》的不同后，得出结论：简本《论语》是一个比《张侯论》更早的融合本。而且，这个融合本也和《张侯论》一样，是以《鲁论》为底本，以《齐论》为校本的。^[2]单成彬先生在将简本与《说文》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论语》进行对勘的基础上，认为此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而且此本与《张侯论》存在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此本原本残缺，曾据别本补抄。^[3]陈东先生通过简文中的避讳用字，认为竹简《论语》已经超出了传统已知汉代三《论》的范围，是汉高祖刘邦时期的抄本，属汉初今文隶书《论语》。^[4]学者经过整理和校勘，发现简本《论语》的情况非常复杂。从文字上来看，在不足今本一半的文字中，差异之处达700多处，几占释文的二分之一。它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语气词多、假借字多，这说明简本《论语》很可能是根据口传《论语》整理而成的。简本亦多用较古老的字形。在词句上，也有一些词句很特殊。在分章上也有独特之处，尤其是《尧曰篇》，简本为二章，“子曰不知名”一章，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面分开，以两行小字连在下面。原简还未发现篇题。简本《论语》与我们能看到的以及文献记载的《古论》、《鲁论》、《齐论》皆有异同，或许其属于三《论》之外西汉早期的一个传本。

三、张侯论（见本章第四节）

第二节 西汉《论语》传习者

一、三《论》传习者考略

（一）《古论语》的传习者

《古论语》的传习者，《汉志》不载，何晏《论语集解序》曰：“《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5]皇侃《论语义疏序》

[1] 孙钦善《四部要籍注疏丛刊本〈论语〉前言》，第4页。

[2] 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见《简帛研究》第三辑，第459—470页。

[3] 单成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见《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第29—38页、124页。

[4] 陈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见《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第4—13页。

[5] 《论语注疏》，第5页。

曰：“《古论》为孔安国所注，无其传学者。”^[1]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孔安国为传，后汉马融亦注之。”^[2]《隋书·经籍志》曰：“孔安国为之传。”^[3]《古论语》的传习者甚少，根据以上文献记载，西汉时期只有孔安国一人。

孔安国（生卒年不详）：字子国，西汉时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十一世孙，孔忠次子，汉代经学家。少学《诗》于申培，受《尚书》于伏生，学识渊博，擅长经学。鲁恭王拆除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皆为古文字，后来，孔安国悉得其书，并将古文《尚书》“以今文字读之”。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孔安国被诏为博士，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相传其晚年作有《古文尚书传》、《论语训解》、《古文孝经传》等书，成为古文《尚书》学派的开创者。孔安国学识渊博，《史记》作者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

按：《〈孔子家语〉后序》言孔安国为《古文论语训》21篇，^[4]《汉志》、《隋志》皆未著录，何晏、陆德明、《隋志》皆言其注《论语》。然自清一代，刘台拱、陈鱣、臧辅堂等都疑此为伪作，至沈涛《论语孔注辨伪》、丁晏《论语孔注证伪》进行了彻底的证伪，然二人之证据并不确凿，孔安国注《论语》还不能轻易被否定，对此，单承彬先生曾有过较为详细的评析。^[5]

（二）《齐论语》的传习者

在谈及《齐论语》的传习者时，《汉书·艺文志》云：“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6]《论语集解序》云：“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7]皇侃《论语义疏序》云：“《齐论》为琅邪王卿等所学。”^[8]《经典释文·序录》曰：“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并传之，唯王阳名家。”^[9]《隋书·经籍志》曰：“《齐》则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10]

[1] 《论语集解义疏》，第4页。

[2] 《经典释文》，第60—61页。

[3] 《隋书》，第939页。

[4]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一十一及刘宝楠《何晏〈论语集解序〉正义》谓此书为“二十一卷”，然汲古阁刊本《孔子家语》及《玉海》卷四十二《艺文经解类》引《家语后序》均作“十一卷”。

[5] 《论语源流考述》，第112—135页。

[6] 《汉书》，第1717页。

[7] 《论语注疏》，第3页。

[8] 《论语集解义疏》，第4页。

[9] 《经典释文》，第60页。

[10] 《隋书》，第939页。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汉代传《齐论》者有王吉、宋畸、王卿、贡禹、五鹿充宗、庸生等六家，兹略述如下：

1. 王吉（？—前48年）：《汉书》有传。字子阳，西汉琅邪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人，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昭帝时为昌邑中尉，直言敢谏。后昌邑王嗣位为帝，即位二十余日便因昏乱被废，他坐罪从事苦役。宣帝时，复征为博士、谏大夫，上疏议论朝政得失。上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吉遂托病辞官。元帝初即位，征吉，吉年老，道病卒。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

按：《汉志》云“传《齐论》者，唯王阳名家”，故《汉志》所录《齐说》29篇，疑为王吉所作。王先谦《汉书补注》在“《齐说》二十九篇”下补注：“《吉传》云王阳说《论语》，即此《齐说》也。”^[1]

2. 宋畸：《汉书》无传，始末不详。《汉书·萧望之传》记载：“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2]《汉书·黄霸传》：“（夏侯）胜出，复为谏大夫，令左冯翊宋畸举霸贤良。”^[3]

3. 王卿：《汉书》无传。《汉书·百官公卿表》：“天汉元年（前100年）济南太守琅邪王卿为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杀。”^[4]《武帝纪》：“（天汉）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5]故王卿为汉武帝时人。翟灏《四书考异》引刘歆《七略》云：“《论语》家及近有琅邪王卿，不审名。”盖“卿”非其名。

4. 贡禹（前124年—前44年）：《汉书》有传。贡禹字少翁，西汉琅邪（今山东诸城）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于世，征为博士。元帝初即位，深闻其贤，征为谏大夫，数虚己问以政事，后迁光禄大夫、长信少府、御史大夫等。他多次上书，奏言治国安民之道，为御史大夫数月卒。

5. 五鹿充宗：《汉书》无传。汉元帝建昭元年（前38年）为少府，贵幸，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与中书令石显、中书仆射牢梁结为党友。五年（前34年）被贬为玄菟太守。

6. 庸生：《汉书》无传。胶东，郡国名。《汉书·儒林传》载孔安国弟子都尉朝授庸

[1] 《汉书补注》，第3117页。

[2] 《汉书》，第3273页。

[3] 《汉书》，第3629页。

[4] 《汉书》，第785页。

[5] 《汉书》，第204页。

生古文《尚书》，庸生又授清河胡常。《张禹传》载张禹壮时从其问《论语》，张禹是西汉元、成间人，盖庸生为宜、元时人。邢昺云“庸生名谭，生盖古谓有德者也”。^[1]

（三）《鲁论语》的传习者

《鲁论语》的传习者，《汉书·艺文志》云：“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2]何晏《论语集解序》引刘向之言：“《鲁论语》……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3]皇侃《论语义疏序》云：“《鲁论》为太子太傅夏侯胜及前将军萧望之、少府夏侯建等所学，以此教授于侯王也。”^[4]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及子玄成、鲁扶卿（郑云‘扶先’，或说，‘先，先生’）、夏侯建、前将军萧望之并传之，各自名家。”^[5]《隋书·经籍志》：“《鲁》则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韦丞相节侯父子、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并名其学。”^[6]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又据他书，共搜得《鲁论》传习者如下：

1. 龚奋：《汉书》无传，生平事迹不详。唯《汉志》言其传《鲁论》。清马国翰在所辑《论语燕传说》之序中说“考韩婴燕人，与（龚）奋同时，各以经师著誉”，龚奋与韩婴为同时人，不知所据。

2. 夏侯胜：《汉书》有传，生卒年已难详考，西汉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的开创者。字长公，东平（今属山东东平）人。少孤，好学，从夏侯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又从简卿、欧阳氏问，为学精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胜以《尚书》授太后，迁长信少府、因议庙乐事下狱。四年夏，会赦，出为谏大夫。上知胜素直，复为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亡威仪。宣扬儒家经书，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年九十卒官。著作已佚。清陈乔枬辑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收入《皇清经解续编》。

按：本传言夏侯胜受诏撰《论语说》，《汉书·艺文志》载“《鲁夏侯说》二十一篇”。盖为夏侯胜所撰。清马国翰辑《夏侯论语说》一卷，认为此为夏侯胜撰。

3. 夏侯建：其传附在《汉书·夏侯传》下。字长卿，夏侯胜从父子。人称“小夏侯”，

[1] 《论语注疏》，第4页。

[2] 《汉书》，第1717页。

[3] 《论语注疏》，第2—3页。

[4] 《论语集解义疏》，第4页。

[5] 《经典释文》，第60页。

[6] 《隋书》，第939页。

西汉今文《尚书》学“小夏侯学”的开创者。从夏侯胜和欧阳高学习今文《尚书》，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颍门名经，宣帝时，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著作已佚。

4. 韦贤（前141年—前62年）：《汉书》有传。字长儒，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通《礼》、《尚书》，以《诗》教授，武帝时征为博士，号称邹鲁大儒。入侍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宣帝初即位，贤以与谋议，安宗庙，赐爵关内侯，食邑。徙为长信少府，以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前71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食邑七万户，十年薨。时，贤七十余，为相五岁，地节三年（前67年）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罢归，加赐第一区。丞相致仕自贤始。年八十二薨，谥曰节侯。

5. 韦玄成（？—前36年）：《汉书》有传。韦贤少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以明经擢为谏大夫，迁大河都尉，拜河南太守。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元帝即位，为少府，迁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国为丞相，为相七年，建昭三年（前36年）薨，谥曰共侯。

6. 鲁扶卿：《汉书》无传，生平事迹不详。《汉书·艺文志》、《张禹传》言其说《论语》，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虽和此同，但他说郑玄本的“扶卿”作“扶先”。王充说“初，孔子孙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1]认为鲁扶卿是鲁人扶卿。

7. 萧望之（？—前47年）：《汉书》有传。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以射策甲科为郎，累迁谏大夫，后代丙吉为御史大夫，左迁太子太傅。历任左冯翊、大鸿胪、御史大夫、太子太傅等职，为太傅时，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甘露三年（前51年），主持石渠阁会议，评奏儒生对《五经》异同的意见。宣帝寝疾，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受遗诏辅政。元帝即位，望之以师傅见尊重，后遭弘恭、石显等陷害，饮鸩自杀，年逾六十。

8. 张禹（？—前5年）：《汉书》有传。字子文，河内轵人（今河南济源东南人）。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

[1] 《论衡·正说篇》，见《论衡校释》第1138页。

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奏寝，罢归故官。久之，试为博士。初元中，授太子《论语》，由是迁光禄大夫。数岁，出为东平内史。成帝即位，以师赐爵关内侯。河平四年（前 25 年）为丞相，封安昌侯，为相六岁。鸿嘉元年（前 20 年）以老病乞骸骨，建平二年（前 5 年）薨，谥曰节侯。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

按：《汉志》有“《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即为张禹所作。

9. 王骏：《汉书》附传：“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驸马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迁谏大夫。”^[1]后又官幽州刺史，司隶校尉、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为御史大夫，六岁病卒。

按：《汉志》载“《鲁王骏说》二十篇”。王骏乃王吉子，王吉传《齐论》名家，王骏虽传《鲁论》，对《齐论》应该也精通。

10. 朱云：《汉书》有传。字游，鲁人，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元帝时，与少府五鹿充宗辩论易学获胜，由是为博士，迁杜陵令，后为槐里令。为人狂直，多次上书抨击朝廷大臣尸位素餐，遂废锢。成帝时，又延劾丞相张禹为佞臣。晚年教授生徒，年七十卒于家。

二、传承不明的诸家

西汉《论语》传习者除了以上外，尚有王尊、班伯、刘向等三人，其传承关系不甚明了，姑附论于此。

1. 刘向：陆德明《论语音义》“周有八士”下注：“郑云成王时，刘向、马融皆以为宣王时。”^[2]刘向亦可能注过《论语》。

2. 王尊：《汉书·王尊传》：“年十三，求为狱小吏。数岁，给事太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太守奇之，除补书佐，署守属监狱。久之，尊称病去，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3]王尊字子赣，西汉涿郡高阳（今河北高阳东）人。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元、成时历任县令、郡太守、部刺史、

[1] 《汉书》，第 3066 页。

[2] 《经典释文》，第 1389 页。

[3] 《汉书》，第 3226—3227 页。

王国相、京兆尹，廉洁奉公，诛恶不避豪强，以致多次被诬免官。与曾任京兆尹的王章，王骏并称为“三王”。

3. 班伯：《汉书·叙传》：“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1]伯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历任奉车都尉、定襄太守等职。年三十八病卒。

第三节《鲁论语》传习者鲁扶卿考

鲁扶卿，生平事迹不详，唯《汉书·艺文志》言其为《鲁论语》传者：

传《鲁论》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2]

《汉书·张禹传》也言其说《论语》：

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3]

而东汉的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云“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4]与《汉书》记载不同。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在谈及《论语》传习者时也言及鲁扶卿：

《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及子玄成、鲁扶卿（郑云，“扶先”，或说，“先，先生”）、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将军萧望之并传之，各自名家。^[5]

记载虽然与《汉志》相同，但陆德明说郑玄云“扶卿”作“扶先”，“先”，又作“先生”讲，看来“鲁扶卿”一名存在着问题，但是历代学者对“鲁扶卿”一名做考证者寥寥无几。那么鲁扶卿应该是什么人呢？是姓鲁名扶卿呢？还是姓扶名卿，鲁国人呢？抑或是姓鲁名扶先，鲁人扶先呢？抑或是其他人呢？

对于鲁扶卿一名，我们已经不能从存世的文献中找到具体资料来证明其为何人，只能凭借相关资料来推测其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序》曰：

《汉志》及《张禹传》、《经典序录》皆言鲁扶卿，是鲁为其姓。《论衡》独

[1] 《汉书》，第4198页。

[2] 《汉书·艺文志》，第1717页。

[3] 《汉书》，第3352页。

[4] 《论衡校释》，第1138页。

[5] 《经典释文》，第60页。

言鲁人扶卿，与《汉志》诸文不同。又荆州刺史似谓扶卿所居之官。^[1]

他认为王充所言不可信。但笔者认为，王充所言不虚。

首先，我们来看《汉志》所载《鲁论语》的传习者，他们分别是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这六人除了龚奋和鲁扶卿无考外，其余四人在《汉书》中皆有传。夏侯胜是东平人，韦贤是鲁国邹人，萧望之是东海兰陵人，张禹是河内轵人。《汉书·瑕丘江公传》云韦贤、夏侯胜皆鲁人，^[2]张禹曾从夏侯建学《鲁论》，夏侯建是夏侯胜从父子，也是东平人。可见，传《鲁论语》的最初都是鲁人，扶卿也应该是鲁人。其次从《汉志》谈及《论语》传家时的行文来看，《汉志》云：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

《齐论》传者除了胶东庸生外，其余各人姓名之前皆加上了官名，胶东庸生前虽无官名，却冠以“胶东”之地名。传《鲁论》者除了鲁扶卿外，各人姓名之前也加上了官名，鲁扶卿前无官名，按照《汉志》的行文情况，“鲁”字也应该是地名。

鲁既然是地名，“扶卿”就应该是姓名了。《汉书》的扶卿，陆德明言“郑玄云‘扶先’”，“先”做“先生”解，那么“卿”和“先”是不是名呢？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先生”是对人的尊称，此称在先秦已经广泛使用，此处不再赘述。然而汉人称“先生”，有时单云“生”，如《史记》、《汉书》等书称酈食其为酈生，称贾谊为贾生、称董仲舒为董生；有时单云“先”，如：

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於轵张恢先所。集解：徐广曰：“先即先生。”^[3]

（《史记·晁错列传》）

夫叔孙先非不忠也。师古曰：先，犹言先生也。^[4]（《汉书·梅福传》）

“卿”也可以用作对人的尊称，如：

荀卿，赵人。索隐：名况。卿者，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 《论语正义》卷二十四，第782页。

[2] 《汉书·瑕丘江公传》：“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见《汉书·儒林传》第3618页。

[3] 《史记》，第2745页。

[4] 《汉书》，第1918—1919页。

[5] 《史记》，第2348页。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索隐：卿者，时人尊重之号，犹如相尊美亦称“子”然也。^[1]（《史记·刺客列传》）

所以，“先”、“卿”二字都是对人的尊称，不是人名。

那“扶”是不是姓呢？在汉代，确实有姓“扶”之人，如《广韵》十虞“扶”字下注“又姓，汉有廷尉扶嘉”，于是，《康熙字典》在手部“扶”下注扶姓的人就是“传《鲁论语》者鲁扶卿”。

综上所述，“鲁扶卿”就是鲁人扶卿，扶是姓，卿是对他的尊称。

第四节 张禹与《张侯论》

如前所述，汉代《论语》有若干版本，各种版本有同有异，而且同一家所传《论语》也有所差异，所以，在西汉后期出现了《论语》的修订本。

《论语》第一个有流传的修订本是《张侯论》，它的作者是生活于西汉末年的张禹。张禹的生平我们在第二节已经提及。《汉书·艺文志》言张禹传《鲁论》名家，其传本“最后而行于世”，但未言明张禹从何处习《鲁论》。至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始云“安昌侯张禹，就建学《鲁论》”。《汉书·张禹传》云“及禹壮，从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2]王阳、庸生是《齐论》传家，张禹此时所学，当是《齐论》。可见，张禹兼习《齐》、《鲁》二《论》，且皆能明习，故其能在“甘露中，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时，“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并且在初元中授太子《论语》。

《汉书·张禹传》又云：“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已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3]从《汉书》的记载来看，“张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张侯论》，是张禹用来授成帝的本子，《论语章句》应该是对《张侯论》所做的章句。但是后世文献对《张侯论》性质的记载并不一致。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4]此言之意，《张侯论》经文当是《鲁论》，而注文兼采《齐》、《鲁》之说。然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云：“禹初学《鲁论》，又杂讲《齐论》，于二《论》之中，择善者抄集，别为一《论》，名之曰

[1] 《史记》，第2526—2527页。

[2] 《汉书》，第3347页。

[3] 《汉书》，第3352页。

[4] 《论语注疏》，第4页。

《张侯论》也。”“此《论》即择《齐》、《鲁》之善，合以为一《论》，故世之学者皆贵重于《张侯论》也。”^[1]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受成帝。”^[2]《隋书·经籍志》：“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3]三书皆云《张侯论》是张禹综合《齐论》、《鲁论》两本之善者，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本子。综合以上记载，张禹是以《鲁论语》名家的，但是他又兼通《齐论》，并且对《齐说》也比较精通，故愚以为《张侯论》当是以《鲁论》为底本，同《齐论》相参校，并从后者吸收了一些内容而成的一个本子，但是此本内容的主流和篇次依然是从《鲁论》而定。而且根据张禹本传，张禹撰《论语章句》，也就是《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曾参考扶卿、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庸生六家之说，此六家之中，四家为《鲁论》，二家为《齐论》，这也证明，《张侯论》是以《鲁论》为主，以《齐论》为辅的。《汉志》把张禹列为《鲁论》大家，将他的著作作为《鲁论》系统，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隋志》言《齐论》之《问王》、《知道》二篇是张禹所删，于是后世即有对其做法加以指责者。如晁公武曰：“汉时《论语》凡有三，而《齐论》有《问王》、《知道》两篇，详其名当是论内圣之道、外王之业，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说而张禹独遗之。禹身不知王凤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势位足以轩轾一世，使斯文尽丧，惜哉。”^[4]其实《张侯论》不收《问王》、《知道》两篇，也是有充分的根据的，诚如马端临所说“《齐论》多于《鲁论》二篇，曰《问王》、《知道》，史称为张禹所删，以此遂无传。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删之。然《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自孔壁出者，章句与《鲁论》不异，惟分《尧曰》‘子张问’以下为一篇，共二十一篇。则《问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无，度必后儒依仿而作，非圣经之本真，此所以不传，非禹所能删也”。^[5]而且，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也无《齐论》多出来的两章。在《张侯论》之前，官方已经对《论语》一书的内容进行过论定。据史书记载，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又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其

[1] 《论语集解义疏·论语集解序》，第2页。

[2] 《经典释文》，第61页。

[3] 《隋书》，第939页。

[4] 《经义考》卷二百一十一，第1085页。

[5] 《经义考》卷二百一十一，第1085页。

中有《论语议奏》十八篇。《齐论》的《问王》、《知道》二篇是去是留，当时应该已经论定。而张禹之《张侯论》的出现应该也是受到了《石渠论》的影响，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要之，《张侯论》在《论语》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书一出，“余家寝微”，东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用的就是此本。《张侯论》依据《鲁论》篇次来编辑，这一篇次又被何晏《论语集解》继承下来，逐步形成了今本《论语》。

第三章 东汉时期《论语》的流变

第一节 东汉《论语》传习者

《论语》不但在西汉时期流传非常广泛，传至东汉，其地位有增无减，这从熹平石经刊刻有《论语》一家即可看出。赵岐在《孟子题辞》中云“《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1]充分反映了《论语》在东汉时的地位。笔者广泛采集，共搜得《论语》在东汉时期的传习者 15 家，现略述如下。

一、包咸、周氏的《论语章句》

何晏《论语集解》云：“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2]《经典释文》、《隋志》皆言如此。

包咸（前 6 年—65 年）：《后汉书》有传。字子良，会稽曲阿（今江苏丹阳）人。少从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王莽末年，返归乡里，将至东海界，为赤眉起义军拘留十余日，被留期间，“晨夜诵经自若”，治学不辍，起义军义而释之。行至东海，立精舍讲授，传播儒家思想文化，因而声名大振。光武即位，乃归乡里。举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拜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永平五年，迁大鸿胪。显宗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于诸卿，咸则皆散与诸生之贫者。病笃，帝亲辇驾临视。年七十二，卒于官。

周氏不详为何人，名字爵里俱佚，其作《论语章句》，诸志皆不著录，唯何晏《论语集解序》言其为《论语章句》。

二、《古论》的传习者

1. 马融（79 年—166 年）：《后汉书》有传。东汉经学家，字季长，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少好学，无常师。从名儒挚恂游学，博通经籍。曾任校书郎、议郎、武都和南郡太守等职。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他博

[1] 《孟子注疏》，第 8 页。

[2] 《论语注疏》，第 4 页。

学宏通，教授的学生常有千余人，郑玄、卢植皆出其门。遍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左氏春秋》已有贾逵、郑众两家注，各有特色，因此，不另作训释，而著《三传异同说》。除注群经外，他兼注《老子》、《淮南子》、《离骚》、《列女传》。他晚年生活阔达奢逸，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开魏、晋清谈家破弃礼教的风气。著作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都有辑录。另有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共21篇，有集已佚。明张溥辑有《马季长集》。

按：马融所注《论语》，何晏说是《古论》，而皇侃以及《隋志》却言其所注为《张侯论》。^[1]邢昺也认为“马融亦为《古文论语训说》”，马融为古文经大师，倡兴古文学，并以古文学教授，故笔者以为何晏所说为是。

2. 许慎（约58年—147年）：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鄢陵）人，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师事贾逵，受古文经学，为马融所推重，时人誉称“五经无双许叔重”。举孝廉，历任校长、太尉阁祭酒。所著有《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对后世影响极大；而《五经异义》已佚，清人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辑注较备。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2]由此可知，《说文解字》所引《论语》是古文《论语》。由于许慎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引《论语》之文的，所以保存了古文《论语》中一些文字的最可靠的特征，学者考订《古论》之文，往往以此为依据。^[3]

三、传承不明的诸家

1. 右师细君：生平事迹不详。惟《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4]由此可见，他也是《论语》的传习者。

2. 盍氏：汉石经《论语》篇末云“而在于萧墙之内，盍毛包周无‘于’（下缺）”。^[5]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据此著录，云：“盍毛于包周并列，是盍氏毛氏并有《论语

[1]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汉有马氏，亦注张侯鲁论也。”《隋志》：“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

[2]《说文解字》第十五上，第316页上。

[3]如马国翰所辑《古论语》就有《说文》所引《论语》之文。

[4]《后汉书》，第2570页。

[5]《隶释》卷十四，第155页。

注》也。”^[1]

3. 毛氏：同上。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据此著录。

按：盍氏、毛氏无考，汉石经列于包咸之后，二人或为西汉时人亦未可知。

4. 刘辅：《后汉书·沛献王传》：“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讖，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2]刘辅为光武帝次子，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右翊公。两年后被徙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公元44年，复徙封沛王，都相县（今安徽濉溪县西北），史称沛献王，公元52年才到相县就国。在国谨节，终始如一，称为贤王。显宗敬重，数加赏赐。立四十六年薨。

5. 包福：《后汉书·儒林传》：“（包咸）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3]

6. 范升：《后汉书》本传云：“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范升字辩卿，代郡（今河北蔚县）人。少孤，依外家居。王莽时为议曹史，反对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建武二年（26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每有大议，辄见访问。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曾与韩歆等互相辩难，反对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7. 郑众（？—83年）：东汉初年著名古文学家、经学家。字仲师，河南开封人。明帝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公元65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建初六年（81年），为大司农，世称郑司农。受诏作《春秋删》19篇。八年，卒官。众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世称郑兴父子为“先郑”，而称郑玄为“后郑”。著作已佚，清马国翰辑有《周礼郑司农（众）解诂》6卷，《郑众春秋牒例章句》1卷。

郑众传《论语》，见于《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门》：“后汉郑众为大司农，传《毛诗》及《左氏条例章句》，又传《周官》、《礼记》、《论语》、《孝经》。”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云：“此所云‘传’谓‘传注’之‘传’。”^[4]朱彝尊《经义考》、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皆据此著录。

8. 贾逵（30年—101年）：《后汉书》有传。东汉经学家、天文学家，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贾谊九世孙。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传》、《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汉明帝时任为郎。汉和帝时任左中郎将，迁侍中，领骑都

[1]《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2156页中。

[2]《后汉书》，第1427页。

[3]《后汉书》，第2570页。

[4]《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2334页下。

尉。所著共百万言，后世称“通儒”。主要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有辑佚。

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其注《论语》，“贾逵《论语注》”条载：“‘当仁不让于师’，（逵）注‘师，众也’。”^[1]不知所出。

9. 何休（129年—182年）：《后汉书·儒林传》：“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2]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滋阳）人。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太傅陈蕃辟之参政。蕃败，休坐废锢。党禁解，又辟司徒、拜议郎，迁谏议大夫。休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善历算，与其师羊弼，根据公羊学博士李育的学说，驳难《左传》和《谷梁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著作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至今保存。

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皆据《后汉书》著录。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何休论语注”条云：“《北唐书钞》卷九十六引《论语》何休注云‘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康案‘何注《隋》、《唐志》已不著录，虞氏未必见其书，所引二语与何晏《集解》引孔注同，未知休字为晏字之误，抑虞氏从他书转引也。’”^[3]曾朴云：“愚见曹栋亭本《北唐书钞》引此，但称何注并无休字，《书钞》讹脱已久，未知孰是。”^[4]今按：《北唐书钞》条为注《论语·雍也篇》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何晏《论语集解》作“孔曰”，皇侃《论语义疏》作“马融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裴驷《集解》引作“何晏曰”。可见《北唐书钞》当是误引，裴驷《史记集解》所说为是。

10. 郑玄（见本章第三节）

11. 麻达：《广韵》下平声“麻韵”下注：“麻亦姓，《风俗通》云：‘齐大夫麻婴之后，汉有麻达注《论语》’。”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皆据此著录。麻达无考，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谓后汉人，不知所本。

[1] 《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2155页上。

[2] 《后汉书》，第2582页。

[3] 《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2114中。

[4] 《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2489下。

第二节 熹平石经与《论语》

一、熹平石经

据史书记载，熹平石经是由汉灵帝于熹平四年（175年）下令刊刻，到光和六年（183年）方才完成，历时九年。熹平石经镌刻的始末，《后汉书·宦者列传》云：

（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1]

《后汉书·蔡邕传》云：

建宁三年，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2]

《后汉书·儒林列传》云：

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飧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3]

根据这些资料记载，可知镌刻石经是东汉统治者为统一经学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以上三段文字，同出一书，然对熹平石经之经数记载却不一致。《宦者列传》、《儒林列传》皆云“五经”，《蔡邕传》云“六经”，《隋书·经籍志》又云“七经”，并著录“《一字石经周易》一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一字石经鲁诗》六卷，《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4]王国维先生在《魏石经考一》中经过细密的考证，认为汉石经经数为“《易》、《书》、《诗》、

[1] 《后汉书》，第2533页。

[2] 《后汉书》，第1990页。

[3] 《后汉书》，第2547页。

[4] 《隋书》，第946页。

《仪礼》、《春秋》一经，并《公羊》、《论语》二传。故汉时谓之五经，或谓之六经，《隋志》谓之七经。除《论语》为专经者所兼习，不特置博士外，其余皆当时博士之所教授也。”^[1]经数之不同，究其实乃分合不同所致，分之，则为“七经”，合之，《论语》为总论六经之书，是太学的基本科目，可不与他经并记，则为“六经”。《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之学，故再合又有“五经”之称。

《后汉书·儒林列传》云石经为“古文、篆、隶三体”，然酈道元《水经注·谷水篇》云：“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树之于堂西。”^[2]《晋书·卫恒传》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3]即以三体为魏石经，《隋书·经籍志》亦云“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洪适《隶释》所载《石经公羊残碑》之文字，其末有“谿典谏议大夫臣马日磾臣赵域议郎臣（缺二字）臣刘宏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杂”数字，^[4]日本学者武义内雄在《汉石经及〈论语〉残字考》一文中，考证了这些残字，结合《水经注》“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以及《后汉书·蔡邕传》注引《洛阳记》“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的记载，认为“其石有此等大儒之名留存，则其为汉石经无疑，此等残石，皆为隶书之碑字，绝无古文及篆字，则汉石经是一种字体，可以证明”。^[5]《隶释》的《石经论语残碑》还有“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工陈兴刻”等字。宋人黄伯思在《记石经与今文不同》中言其曾得当时各家所得石经之拓本，《论语》之末题“诏书与博士官左立郎中臣”，书上臣下皆缺，当是著书者姓名。……独刻者陈兴甚完”，亦有《隶释·石经公羊残碑》之残存人名爵，据此，黄氏认为“此盖鸿都一字石经”。^[6]《熹平石经》为一字石经，共刊七经，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观点。

《熹平石经》于光和六年刻成后即树于洛阳太学门前，董卓之乱时，碑文残缺于战火之中，又几经迁徙，碑文复告漫灭，至“（唐）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7]残石自宋代起偶有出土，但这些石经只见各家著录，原拓本不知存于何处。现存只有黄易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购得之《盘庚》五行，行五六字：《尧曰》四行，行六至九字：《为政》八行，行六至十字。皆为宋拓本，

[1] 《观堂集林》卷二十，第958—959页。

[2] 《水经注》卷十六，第131—132页。

[3] 《晋书》卷三十六，第1061页。

[4] 《隶释》，第153页。

[5] 《先秦经籍考》中册，第29页。

[6] 《东观余论》，第110—111页。

[7] 《隋书·经籍志》，第947页。

在1972年为故宫博物院收存。^[1]1922年河南洛阳朱家古墩出土的石经残石甚多，是《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论语》七经，与《隋书·经籍志》所记吻合。以上所出残石之较大者，皆为两面刻字，为数百字。小者只一面，存一、二字，皆分散各处。石经之书体，从现存石经拓本的书法特色查之，可见明显不同的书体，仅从四川博物馆所藏的两件拓本即可窥见一斑。总观石经的书法，字体精美，方整严谨，然笔法不一，有的挺拔峻峭，法度凝重；有的飘逸秀美，姿态怡然；有的刀锋铿锵又不失柔美。这些不同风格的字体当出自不同书家之手。这些字体虽刚柔有别，但仍是东汉时通行的标准书体，并没有跳出当时的一般书风，是标准的汉隶。^[2]

二、熹平石经《论语》

《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字石经论语》一卷”，并注“梁有二卷”，两《唐志》均录蔡邕注“《今字石经论语》二卷”，两书所著，今无处可见。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载石经《论语》与今本不同之有九处，洪适《隶释》中亦载有石经残字八篇，分别为《学而》、《为政》、《八佾》、《里仁》、《阳货》、《微子》、《子张》、《尧曰》，《论语》前四篇后四篇之文，中间缺十二篇。洪适在对每篇依据隶字笔画以楷书写定的同时，又用当时版本对石经之文字进行考释，列出二者的不同之处，且总结文字的不同，“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异。其文有增损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异而训不远，若‘置其杖’、‘贾之哉’者。汉人作文，不避国讳，威宗讳志，顺帝讳保，石经皆临文不易”。^[3]对《论语》残字与今本的异文，清代学者考证之作颇多，今无须赘述。^[4]

《隶释》所载石经《论语》之《八佾》、《阳货》两篇篇末皆有凡“二十六章”的字样，《学而》篇末有“人之不（下缺）章”的字样，可知，石经于每篇必计其章。《尧曰》篇末又总全篇之文字“凡廿篇，万五千七百一（缺一字）字”。《尧曰》篇末还有校记：“贾诸贾之哉，包周（缺四字）。盖肆乎其肆也（缺一字，）周（下缺）曰，言（下缺一字）。而在于萧墙之内，盍毛包周无于（下缺）。”^[5]

石经《论语》之底本，王国维先生考证曰：“《论语》后有“包、周”及“盍、毛、包、周”字，是《论语》亦用某本而兼存盍、毛、包、周诸本异字也……石经之刊，为万世定本，既不能尽刊诸家，又不可专据一家，则用一家之本，而于后复列学官所立诸

[1]《碑帖鉴定》，第63页。

[2]参见谢凌《熹平石经—中国第一部官定经本》，《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第38页。

[3]《隶释》，第155页。

[4]如翁方纲《石经残字考》，冯登府《汉石经考异》等。

[5]《隶释》，第155页。

家之异同，固其所也。然汉学官所立皆今文，无古文，故石经但列今文诸经异同，至今文与古文之异同，则未及也。^[1]依据王氏之考证，汉石经《论语》当是以一本为底本而兼存今本诸家之异同。那么这个底本是什么本子呢？被用作《论语》校本的盍、毛、包、周四家中，盍、毛二家无考，包、周二人皆据《张侯论》为《论语章句》，包咸还曾教授皇太子《论语》，那么包、周两家《论语》属于《鲁论语》的系统，且立于官学已无疑。依据石经选择底本的标准，《论语》之底本当属于今本。日本学者武义内雄在《汉石经及〈论语〉残字考》一文中通过分析石经之样式，认为石经《论语》无“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章，^[2]石经《论语》共二十篇，《尧曰》篇末没有《不知命》一章，据此可以推断石经的底本是《鲁论语》系统的本子。《汉书·张禹传》曾说《张侯论》“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3]从这种情况来看，石经《论语》用的底本应该就是《张侯论》了。

第三节 郑玄与《论语注》

一、郑玄简介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生活的时期，正是汉代纲纪颓坏，党锢狱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的时代。他自幼家贫好学，13岁已能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青年时代不乐为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凡“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4]初师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自以为山东无人可以求教，乃西入关，由卢植引荐入经古文家扶风马融门下求学，深得其道。郑玄游学十余年，40岁时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近千人。44岁时遭党锢之祸，遂杜门不出，潜心著述。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当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东汉建立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等人争论古今学不休，后经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郑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58岁时，党禁解。60岁时，大将军何进征辟，郑玄不就官逃归。

[1] 王国维《魏石经考三》，见《观堂集林》卷二十，第963—964页。

[2] 《先秦经籍考》中册，第50页。

[3] 《汉书》，第3352页。

[4] 《后汉书》，第1209页。

往后的十多年里，郑玄勤奋著述。汉献帝建安五年病卒，时年74岁。

郑玄一生无意仕途，“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1]他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据《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2]该书所列并非郑玄经注的全部，至少还有《周礼》未被该书提及。郑玄还给大量纬书作注。他所注的纬书，涉及到《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等，《易纬》之属，有《易纬·乾凿度》、《易纬·通卦验》、《易纬·坤灵图》、《易纬·稽览图》、《易纬·是类谋》、《易纬·辨终备》等六种。《书纬》之属，有《尚书·考灵曜》、《尚书·帝命验》、《尚书·璇玑铃》、《尚书·刑德放》、《尚书·运期授》、《尚书·中候》等六种。他还给《乾象历》等书作注。郑玄除对经书、纬书作注外，还撰写了不少论著。他说：“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所谓“论”，即论述，包括考辨方面的著作。如《六艺论》、《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驳五经异义》、《鲁礼禘祫义》、《丧服变除》等。所谓“赞”，犹叙录，包括序、目录方面的著作。如《易赞》、《书赞》、《毛诗谱》、《三礼目录》、《孔子弟子目录》等。此外，尚有《答临孝存周礼难》、《皇后敬父母议》、《戒子益恩书》等。据清人郑珍《郑学录》统计，郑玄著述约有60种。《后汉书·郑玄列传》称“凡百余万言”。

郑玄生当汉末，此时由于“浮华”、“交游”之风兴起，以文会友、交友以方的需要，经学知识分子打破家法师法的界限，外出求学，学无常师，经今古文学也在相互融合、渗透。郑玄就是在这种风气下游学多年，从师多人，“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经通今古，兼综博采，成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前辈和当时学者经学研究的基础上，综合众家传注训诂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利用训诂、校勘、考证的方法整理古籍，取得了超越前修、卓尔不凡的成就。他打破学派的门户之见而杂糅诸家，以古学为宗，但是并不排斥今文，而是各取所长，互相补充，造诣精深，义据宏通。《后汉书》本传论赞道：“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诤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3]魏晋南北朝时期，郑玄的经注一直被儒家学者所尊奉和推崇。至唐太宗贞观年间，孔颖达等人奉敕撰《五经正义》，郑玄的《毛诗传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都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读本，被采用。唐代的“九经”，有四种采用

[1] 《后汉书》，第1209页。

[2] 《后汉书》，第1212页。

[3] 《后汉书》，第1212—1213页。

郑玄的注。到宋代，上述四种经注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官方教材。《毛诗笺》和三《礼》注，以大量篇幅考订名物制度，训诂精湛，校雠严密，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资料。郑玄的其他经注和论著，多有亡佚，清人辑佚之作有多种，如袁钧《郑氏佚书》、孔广林《通德遗书所见录》、黄奭《高密遗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

二、《论语注》

1. 《论语注》的性质

《后汉书·郑玄列传》列郑玄所注群经，其中就有《论语》。^[1]何晏《论语集解序》曰：“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2]皇侃义疏曰：“郑康成又就《鲁论》篇章，及考校《齐》、《古》二《论》，亦注于《张论》也。”^[3]《经典释文·序录》曰：“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考之《齐》、《古》为之注焉。”^[4]《隋书·经籍志》曰：“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5]以上诸家所记大致不异，后世研究者也多本三家之说，认为郑玄所注《论语》，乃是以张禹《鲁论》为底本，又以《古论》、《齐论》较之。如罗振玉在《〈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中，根据敦煌所出《论语》郑氏注残卷题有“孔氏本”的字样，并结合《经典释文》中“从《古》”的记载，认为：“《释文》所举郑氏校正诸字，则皆改《鲁》从《古》，无一从《齐》者，始悟此卷所谓‘孔氏本’者，乃据孔氏《古论》改正《张侯论》，而何、皇诸家谓考校《齐》、《鲁》者，盖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郑君既注于《张论》，而不异兼采《齐论》，其实固仅据《古》以正《鲁》也。”^[6]王国维却认为“郑注《论语》，以其篇章言则为《鲁论》，以其字句言实同孔本”。^[7]作者认为，郑玄《论语注》的字句并非全从《古论》，因为：（1）桓谭在《新论》中云《古论语》与《齐》、《鲁》“文异者四百余字”，如《鲁论》与《古论》不同之处皆从《古论》的话，“从《古》”之处应该在《论语》郑玄注中较为普遍，然我们至今所见，只有二十多字。（2）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说》为基础，采《齐说》的合理成分，

[1] 郑玄对《论语》的研究成果还有：《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古文论语》十卷，郑玄注”；“《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郑玄撰”；两《唐志》著录“《论语释义》十卷，郑玄注”。

[2] 《论语注疏》，第5页。

[3] 《论语集解义疏》，第4页。

[4] 《经典释文》，第61页。

[5] 《隋书》，第939页。

[6]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153—154页。

[7] 《观堂集林》，第170页。

作《鲁安昌侯说》，即《张侯论》。其说影响非常广泛，东汉以《论语》名家者包咸、周氏，都作有《论语章句》，并出自《张侯论》。自《张侯论》行，《齐论语》渐无人传习。而古文《论语》一直在民间流传，东汉马融曾为之作训说。郑玄注《论语》就是以《张侯论》为底本，以《古论》作校本的。因为《张侯论》中本身就含有《齐》，故郑玄仅从《古》改《鲁》，未从《齐》改《鲁》。(3) 郑玄精于校勘，他广罗众本，诸本互校，择优而从，兼采今古文。他校《仪礼》，有今文、古文的不同。《后汉书·儒林列传》“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注中有所谓“今文”者，乃小戴本；有所谓“古文”者，乃得自孔壁之古文《礼》。他参用二本，从今文者，则今文在经，古文出注；从古文者，则古文在经，今文出注。经文采用今文本，注文则曰“古文某作某”；经文采用古文本，注文则曰“今文某作某”。所以，郑玄《论语注》之经文，乃是杂糅三《论》而成。

2. 《论语注》的体例

(1) 校出异文。郑玄以古文《论语》校《张侯论》，校出的异文在注中说明。如《学而》：“传不习乎？”郑注云：“《鲁》读传为专，今从古。”《释文》所载，有二十四条。

(2) 校正误字。如《子罕》：“麻冕，礼也。今也纯，俭。”郑注：“纯，当为缁。”有时通过考证，指出误字。如《宪问》：“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郑注：“伯夷、叔齐、虞仲，辟世者。荷蓀、长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连，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舆，辟言者也。七，当为‘十’字之误也。”

(3) 注明读音。注明难读的字或易读错的字之读音，常用“读曰”、“读为”。如《先进》：“异乎三子者之撰。”郑注：“撰读曰詮。詮之言善也。”《子张》：“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郑注：“厉读为赖，恃赖也。”

(4) 随文释词。大体同其他经注。如《为政》：“子张学干禄。”郑注：“子张，弟子也，姓颛孙，名师，字子张也。干，求也。禄，禄位也。”常用的术语有“曰”、“为”、“谓”、“犹”、“言”等。如《学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郑注：“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雍也》：“以与尔乡里邻党乎！”郑注：“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

(5) 解释句意。如《里仁》：“择不处仁，焉得知？”郑注：“求善居，而不处仁者之里，不得为有知也。”有时在释词之后接着释句意，阐明句子的背景，如《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郑曰：“牲生曰饩。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故欲去其羊。”有时也说明比喻义。如《八佾》：“绘

事后素。”郑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采，然后以素分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

(6) 串讲全段。如《子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若乡人之善者善之，乡人之恶者恶之。’”郑注：“一乡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为善。何者？此人或者行与众同，或朋党矣。子贡又曰：若一乡之人皆恶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为恶也。何者？此人或者行与众异，或孤特矣。不若乡人之善行者善之，恶行者恶之，与善人同，复与恶人异。道理胜于前，故知其实善。”

3.《论语注》的价值

第一，从郑玄《论语注》的佚文来看，其注释简明易懂，释义准确，对阅读《论语》有一定参考价值。如《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郑注：“此道谓礼也。动容貌，能济济跄跄，则人不敢暴慢之。正颜色，能矜庄严栗，则人不敢欺诈之。出辞气，能顺而说之，则无恶戾之言入于耳。”

第二，《论语注》涉及校勘的内容尚存 27 条，对于了解古文《论语》和《鲁论语》的差别有一定的价值。如《阳货》：“归孔子豚。”郑注：“鲁读馈为归，今从古。”

第三，郑玄在《论语注》中也倾注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观点，对研究郑玄的思想有一定的价值。如《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郑注：“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这体现出了郑玄的教育思想。郑玄在注释中还表现出了以孝为本的政治思想。如《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郑注：“孝为百行之本。言人之为行，莫先于孝。”

4、《论语郑氏注》残卷

《经典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均著录郑玄《论语注》十卷。魏晋时期，《论语郑氏注》与曹魏何晏撰《论语集解》皆立于国学；南北朝时期，郑注在南朝不受重视，在北朝流传颇广，《隋书·经籍志》中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唐代独宗“郑学”，流传更盛。五代、北宋修两《唐书》，均以入《志》。但至北宋已鲜见流传，如北宋邢昺《论语疏》所引《论语注》，显见转引痕迹，同时官修《太平御览》虽也屡引此书，却多不标明注者姓名，亦不以入征引书目，说明作者所见已非完善之本。南宋王应麟已经开始对《论语注》进行辑佚，清人惠栋、孔广林、宋翔凤、袁钧、王谟、黄奭、马国翰等人均有辑本传世，然而综合各家所辑，不足原书的十分之一，无法窥得《郑注》原貌。

20 世纪初以来，人们在敦煌秘室和新疆吐鲁番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不少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为我们研究郑注《论语》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郑玄《论语注》敦煌抄本现存有四种：英国斯坦因 3339 号本、6121 号本、法国伯希和 2510 号本、日本书道博物馆本。其中伯希和 2510 号本是最长的卷子。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共 224 行，残存《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四篇。卷尾题“龙纪二年（890 年）敦煌县……”的款识。1915 年罗振玉从法国伯希和处获影印件。不仅数量多，而且堪称善本。罗振玉叹道：“天祐斯文，俾不终闕于穷裔石室，岂非治郑学者之至宝耶？”^[1]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 19 号、27 号、85 号、184 号、363 号五座墓中，共发现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二十多件。在这些残卷中，最完整的是唐景龙四年（710 年）卜天寿写的长卷。这件郑注出自 363 号墓，是作为死者的书籍随葬的，内容相对完整，行数也最多。该写本残卷，长 538 厘米，宽 27 厘米，共 178 行，每行 20 字左右，存《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 15 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卷末题记为“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口”、“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口”。由此可知：抄经者名叫卜天寿，十二岁，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抄完的。由于抄写者仅十二岁，所以抄卷中有不少错别字。^[2]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其年代早于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180 年，并且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的，其文献学上的价值不言而喻。它又往往与《经典释文》等书所引郑本相合，从而证明见引于各书的郑注《论语》大体是可信的，郑本确有“以古正鲁”之事。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所见郑注（包括残缺不全者）共 147 条，可以与散见于各书的郑注相对照，对研究现存郑注佚文有纠谬补证之用。如清马国翰辑《论语郑氏注》各条，属于写本起讫范围以内的，全部合于写本。其中见引于《论语集解》和《太平御览》的郑注也基本一致。见引于其他经解和《经典释文》的郑注，注文仅摘取其对某事物或某字解释的数语，因而少于写本。

第四节 《论语讖》及其辑佚

讖纬是兴盛于两汉时期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它对两汉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 罗振玉《〈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见《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 156 页。

[2] 参见《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见《考古》1972 年第 2 期，第 51—53 页；《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见《文物》1972 年第 2 期，第 13—15 页。

所谓“讖”，即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冥冥之中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说文》云：“讖，验也。”《后汉书·张衡传》云：“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讖书。”^[1]《后汉书·光武帝纪》：“宛人李通等以图讖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李贤注曰：“讖，符命之书。讖，验也，言为王受命之验也。”^[2]讖的起源很早，如《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秦讖”、“赵讖”，以及《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等皆是此类。纬是与经相对而言的，其特点是以讖说经，以经证讖。《释名·释典艺》云：“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清代苏舆《释名疏证补》指出：“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也。”^[3]可见纬的实质是神学迷信、阴阳灾异之说与儒家经义的结合。与讖相比，纬的出现较晚，通常认为它最早见于《汉书·李寻传》，李寻上王根书中提到：“太微四门，广开大道，五经六纬，尊术显士。”^[4]

讖与纬本来相互独立，但随着各自的发展，二者逐渐合流，统称讖纬。“汉代的讖纬是儒学宗教神学化的产物，在汉人的著述中所谓“经讖”、“图讖”实际上都包括纬书，而“讖”、“纬”也往往互称，并无区别。”^[5]讖纬的兴起，张衡言“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不为不戒？则知图讖成于哀、平之际也。”^[6]《后汉书·方术列传》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屈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7]《隋书·经籍志》云“起王莽好命符，光武以图讖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讖。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讖为说。”^[8]

讖纬自魏晋以后屡遭禁绝，隋唐时已大量散失。《隋书·经籍志》说“至（刘）宋大明中，始禁图讖，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隋文帝）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9]《隋书·经籍志》著录讖纬尚有13部92卷。到了新旧《唐书》仅存郑玄、宋均二家所注讖纬9部84卷。至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经籍考》里唯存《易纬》8种及《礼纬·古文嘉》一种。今传纬书，皆为辑佚之作。

[1]《后汉书》，第1912页。

[2]《后汉书》，第2—3页。

[3]《释名疏证补》，第309页。

[4]《汉书》，第3179页。

[5]《讖纬论略》，第9页。

[6]《后汉书》，第1912页。

[7]《后汉书》，第2705页。

[8]《隋书》，第941页。

[9]同上。

汉代谶纬如此兴盛,《论语》自然也为时人所 used,有谶纬之书出现。《白虎通义·辟雍篇》引“《论语谶》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1]可见《论语谶》在东汉初即已流传。

《隋书·经籍志》著录“《论语谶》八卷,宋均注”,两《唐书》皆著录宋均注《论语纬》十卷,题谶曰纬,比《隋志》著录多两卷,大约两者内容不完全相同。^[2]宋元以来不见著录,盖散佚。但语句多为《周礼序》、《礼记序》、《初学记》、《博物志》、《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所引,后世多据此辑佚。

自明以来,对《论语谶》进行著录和辑佚的主要有以下几家:明代孙穀的《古微书》,杨乔岳编、杜士芬校的《纬书》;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殷元正的《集纬》,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以及乔松年的《纬攷》。综合各家所辑,《论语谶》的篇目可考者有《论语比考谶》、《论语撰考谶》、《论语摘辅象》、《论语摘衰圣》、《论语阴骘谶》、《论语素王受命论》、《论语纠滑谶》、《论语崇爵谶》。《论语谶》的内容特别广泛,唐明贵先生在《〈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一书中概括其内容主要有:第一,神化孔子;第二,对《论语》经文的解释和发挥;第三,讲符瑞,宣传君权神授说;第四,保留有古史和神话传说;第五,保存了大量的天文地理知识;第六,保存有谶语。^[3]

[1]《白虎通疏证》,第255页。

[2]钟肇鹏先生认为:《论语》自战国秦汉以来本属于传记,与五经并非同等的地位,不能列为经典。既非经典,所以不能有“纬”。但由于谶纬的性质相同,互称无别。所以《论语谶》也称《论语纬》。见《谶纬论略》第61页。

[3]详说见《〈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第126—128页。

第四章 《论语》及两汉注本的辑佚

《古论》、《齐论》、《鲁论》，《隋》、《唐志》皆不著录，盖散佚已久。三《论》在汉代的注本也都已经亡佚了，现存的《论语》版本是经过汉代张禹、郑玄修订过的本子，故三《论》的原本面貌已不可见，只有《鲁论》尚可以从今本以及汉石经残本中窥得一些面貌，^[1]而《古论》、《齐论》已经不可考见。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西汉时期《论语》的注释之作有《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除此之外，两汉时期为《论语》作注者尚有孔安国、盍氏、毛氏、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麻达、何休等人，但是，除了郑玄之外，其余各家为《论语》所作的注释，《隋》、《唐志》均已不载，盖佚失已久。而郑玄之《论语注》，五代以后，逐渐亡佚，北宋时已无全本，南宋则连残本也看不到了。南宋时，王应麟已经开始对郑玄《论语注》进行辑佚。^[2]至清一代，随着辑佚学的发展，对汉代《论语》注释之作进行辑佚的学者增多，无论是清儒的合辑本，还是单辑本，皆有对汉代《论语》佚注的辑佚。现将《论语》及汉代《论语》佚注的辑佚情况略述如下。

第一节 《古》《齐论语》的辑佚

一、《古论语》的辑佚

《古论语》的辑佚，有《古论语》十卷，清人马国翰辑，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其材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史记》所引《论语》之文。
2. 《说文解字》所引《论语》。
3. 《后汉书·延笃传》延笃引《论语》之文。
4. 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孔安国、马融以及王肃注之经文。

[1] 《鲁论语》现有清于鬯撰《新定鲁论语述》二十卷，见《于香草遗著丛辑》；钟文丞撰《鲁论语》一卷，见《豫恕堂丛书》；徐养原撰《论语鲁读考》一卷，见《皇清经解续编》及《湖州丛书》，足资参考。

[2] 王应麟辑郑玄注《古文论语》二卷，清袁均认为“今所传《古文论语注》，托名王伯厚者，东吴惠栋辈伪为”，（见《郑氏佚书·孔子弟子目录》）陈鱣也认为“近有集郑注《古文论语》二卷，托名王应麟”。（见《论语古训》陈鱣自序）无论是否为托名，都是在诸家之前对《论语注》的辑佚。

5.《经典释文》中郑曰鲁读某为某，今从古处。

6. 郭忠恕《汉简》所载《古论语》之文。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言《古论》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马氏所辑《古论语》篇次从皇侃说，而其他篇次，马氏认为“《为政》以下当依序之”。今存六卷篇目为：

卷一：《学而》第一，《乡党》第二；

卷二：《雍也》第三，《为政》第四；

卷三：《八佾》第五，《里仁》第六；

卷四：《公治长》第七，《述而》第八；

卷五：《泰伯》第九，《子罕》第十；

卷六：《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

马国翰此辑专采《古论语》经文，多不可据信，如以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凡《史记》引《论语》，皆古文；延笃受业于马融，为古文学者；王肃善贾逵、马融之学，亦为古文学者。司马迁虽从孔安国问故，但不能说明其所引《论语》之文皆为《古文》，况《汉书·司马迁传》明载“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1]并未言及《古论语》。王肃注《古论》，并无明证。延笃虽然受业马融，但不能说明其引必为《古论》。汉人并不严守师法，如《齐论》传者王吉之子王骏传《鲁论》，扶卿从孔安国受《古论》，其为《鲁论》传家，刘向治《谷梁》而刘歆治《左氏》。故这些引文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二、《齐论语》的辑佚

《齐论》的辑佚，有《齐论语》一卷，（清）马国翰辑，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齐论语问王知道逸文补》一卷，（清）王绍兰辑，见《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七种》。^[2]

马国翰所辑《齐论语》，凡64条，按今之《论语》篇次分配，二十篇皆有文字可见。其资料来源及依据主要有：

1. 王吉、贡禹为《齐论》传者，《汉书·王吉传》用《论语》二事，《贡禹传》引《论语》一事。

2.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齐论语》齐人所传”，董仲舒，广川人，地属

[1]《汉书》，第3607页。

[2]此书作者未见。《古佚书辑本目录》云：王绍兰所辑《问王》与马国翰同，又从《孟子》、《说苑》等采得孔子语九节，多有“知道”、“知王道”之语。

齐，《汉书》本传《对策》及其所著《春秋繁露》，与《鲁》、《古》不同，而于王吉所引有合，为《齐论语》之文。

3. 陆德明《释文》云“按，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凡《释文》等引郑玄本异文与《鲁》异而郑玄又不言从《古》者。

4. 《经典释文》所引郑本与今本不同者。

5. 《齐论》的《问王》、《知道》两篇，王应麟疑“问王”即“问玉”，朱彝尊《经义考》定为《问玉篇》，《说文》、《初学记》等书引《逸论语》详言玉事，马氏据以辑入。

6. 《白虎通》、《礼记正义》、《玉篇》、《路史》等引《论语》，或今《论》所无以及字句异者，亦为《齐论》之佚，并据辑补。

马国翰此辑虽然为我们探究《齐论》的原貌提供了一条思路，但是其所辑并不可完全据信。如董仲舒虽是齐人，但他不一定传《齐论》，其所引《论语》之辞也未必是《齐论》之文，《汉书·董仲舒传》所引《论语》与今本有很多相同之处，且不同主要在于把“子曰”改为“孔子曰”。《释文》及敦煌郑注残卷于今本所有异文，皆不见言从《齐》者，故其从《释文》所辑以为《齐论》者，并无确凿之证据。罗泌《路史》引《逸论语》，马氏认为“《释文》云‘《齐论》章句颇多于《鲁论》’，此所引多《鲁论》一句，《齐论语》也”，^[1]亦缺乏证据。

关于《逸论语》的问题，至今并无定论。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了两条《逸论语》的资料。“璵”字下解云：“《逸论语》曰：‘玉粲之璵兮，其璵猛也’”。“瑩”字下解云：“《逸论语》曰：‘如玉之瑩。’”^[2]（这两条亦被辑入《齐论》）据朱彝尊考证，除《说文》外，《逸论语》还见于《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3]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张禹《鲁论》所无，则谓之《逸论语》。”^[4]但是孔子言论在汉初流传的非常多，如果把《鲁论》所无者定为《齐论》之文，实在是无稽之谈。

至于《齐论》多出的《问王》、《知道》两篇，马国翰据王应麟、朱彝尊之说采得六节。但是后人对此二篇说法不一。《隋书·经籍志》言：“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5]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问王》疑即《问玉》也，篆文相似。”^[6]朱彝尊《经义考》认为：“《论语》二十篇皆就首章字义名篇，

[1] 《玉函山房辑佚书》，第1639页下。

[2] 《说文解字》卷一上，第12页上。

[3] 《经义考》卷二百一十一，第1084页。

[4] 《说文解字注》，第14页上。

[5] 《隋书》，第939页。

[6] 《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1403页下。

非有包括全篇之义。今《逸论语》见于《说文》、《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其论玉之属特详。窃疑《齐论》所逸二篇，其一乃《问玉》，非《问王》也。考之撰法，三画正均者为王，中画近上者为玉，初无大异，因讹玉为王耳，王伯厚亦云《问王》疑即《问玉》，竄其然乎？”^[1]然《齐论》所失两篇，已无从考证，愚以为王、朱之说不能成立。又“美哉璠玕，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一则孚胜。”此句《初学记》、《太平御览》皆引为《逸论语》，然许慎《说文》只言“孔子曰”，是否出于《论语》尚不可考证，且《说文》引《论语》处已明言之。《初学记》、《太平御览》认为是《逸论语》，马氏又据以辑入《齐论》，完全不合理。另《初学记》、《太平御览》皆引《逸论语》：“玉十谓之区，治玉谓之琢，又谓之雕。璫，玉色鲜白也；莹，玉色也；瑛，玉光也；琤，赤玉也；璿璣瑜，美玉也；璫，三采玉也；玲珑瑳瑳瑳，玉声也；璫，玉佩也；瑱，充耳也；璫，玉饰以水藻也。”全为论玉之属，与《说文》所引文意不相符合。马氏又据《礼记正义》辑得《知道》一节。《问王》、《知道》二篇久佚，其内容到底如何，在没有新出土资料问世之前，已经是不可考证了。

第二节《论语》汉注的合辑本

辑者	书名	卷数	出处
清·惠栋	论语古义	1	《九经古义》卷十六
清·余萧客	论语钩沉	1	《古经解钩沉》卷二十五
清·陈鱣	论语古训	10	单行本
清·潘维城	论语古注集笺	20 ^[2]	单行本
			《皇清经解续编》
清·梁廷桢	论语古解	10	《藤花亭十七种》(未见)
清·俞樾	论语古注择从	1	《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卷十五
清·张佩纶	论语汉说		《张佩纶杂稿》(未见)

惠栋所辑《论语古义》，“讨论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于当时者”，以期恢复《论语》之古音古义。共采得五十余节，如栋所作他书，搜采旧文，旁征博引，相互参证。条文较少，成就并不显著，但是，他汇集汉儒经注佚文，进行考辨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论语》佚注辑佚之先河。

[1]《经义考》卷二百一十一，第1084页。

[2]光绪七年六月江苏书局刊刻《论语古注集笺》共十卷，以《论语》二十篇，每两篇为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作20卷。

余萧客采录唐代以前诸儒训诂《论语》之作散失者，“辞条丰蔚，则撮其精英；一二仅存，则随条辄录，”成《论语钩沉》一卷，余氏在《叙录·古经解姓氏目录》中备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注义训，其中汉代为《论语》作注者共六家：（1）孔安国《古论语传》，（2）包咸《论语章句》，（3）周氏《论语章句》，（4）马融《古论语训说》，（5）何休《论语注》，（6）郑玄《论语注》。六家之说，余氏咸有辑佚，尤以郑玄为多。是书首录《仪礼疏》卷八所载郑玄《论语注》之《序》，次据《艺文类聚》卷五十五采得谢道韞之《论语赞》，后录《论语》正文。佚文来源非常广泛，从诸家注疏所引到史传类书百家杂注，凡涉六家《论语》义训者，咸有所辑，如《魏书》、《读书杂钞》、《资暇集》、《任渊山谷诗注》、《水经注》等书，在其他家《论语》佚注辑佚中并不多见。但和其他家相比，余氏只是照录佚文，不加考证，亦无校勘。

陈鱣以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各家为主，兼采《释文》及他书所引汉、魏人旧注，成《论语古训》十卷，以存汉魏经师之遗义。二十篇经文全部著录，以今《论语》篇次分配之，每两篇为一卷。书首有阮元序及陈鱣自序，自序于乾隆五十九年，是年已经付于刊刻。卷首附郑玄《论语序》及《论语孔子弟子目录》。陈氏此辑汉代《论语》佚注包括孔安国、马融、包咸、周氏、郑玄五家之注。是书所辑，先录经文，次列注文，注文下列佚文出处，时加按语以己意疏通证明文意，郑氏之说尤甚。凡经文以邢昺正义本为底本，而以汉唐石经，皇侃《义疏》、高丽《集解》本、《经典释文》及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异》、物观《补遗》校注于下，见于他书者，亦间为援证。注文以某曰领起，以明何人之训。陈鱣此辑，古训精善者非常多，阮元在序中列举数例予以说明。鱣所征引及考证，简而不芜，裨益甚多。全录经文，颇便观览。

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维城未及编次而卒，歿后二十三年才由其子赐爵编撰成书。卷末附《论语考》一卷，又仿陈鱣《论语古训》之例，附郑注《论语序》及《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其“笺”或列于简端，或为条记。维城所辑，与陈鱣《论语古训》大体相当，唯于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孔安国注和何晏自注皆置不录。每章皆有“注”有“笺”。注者，多引汉魏古注，并标注出处。笺者，广征博采清儒之说，汇集颇富，然少有发明，于诸家之异解也少有辨正，于义不安者，亦未及纠缪。

俞樾认为自《论语集注》行而古注束于高阁，古注自有不可废者，故择古注之善者而为《论语古注择从》一卷，共采古注 29 条，其中汉注 22 条，包括孔安国、马融、包咸、郑玄等人之注。其体例先列经文，次列古注，然后加按语。按语以朱注较古注，斥朱申古。俞樾此书皆古注之精善者，虽仅一卷，不可忽视。

按：因总辑本多数辑唐以前旧注，不单是汉注，故对各书做简述。以下单辑本则只列目录。

第三节《论语》汉注的单辑本

一、《论语燕传说》之辑佚

马国翰辑《论语燕传说》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目耕贴·续补经编论语类》。

二、夏侯胜《论语说》之辑佚

马国翰辑《夏侯论语说》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目耕贴·续补经编论语类》。

三、王骏《论语说》之辑佚

马国翰辑《王氏论语说》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目耕贴·续补经编论语类》。

四、孔安国《古文论语训解》^[1]之辑佚

辑者	佚书名	卷数	出处
清·马国翰	论语孔氏训解	11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
清·王仁俊	论语孔注	1	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经编论语孟子类
	论语孔氏注 ^[2]	1	十三经汉注
民国·龙璋	孔注论语	1	小学搜佚下编补

五、包咸《论语章句》之辑佚

辑者	佚书名	卷数	出处
清·马国翰	论语包氏章句	2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
清·王仁俊	论语包注	1	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经编论语孟子类
			十三经汉注
民国·龙璋	包咸注论语	1	小学搜佚下编补

六、周氏《论语章句》之辑佚

马国翰辑有《论语周氏章句》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

[1]此书名从何晏《论语集解序》。辑佚者所辑《论语》各家佚注，书名不甚相同，作者于表中著录时从辑本而定。

[2]同一辑本，因版本不同而书名有异，也有的卷帙有异，故再次著录，下同。

七、马融《论语注》之辑佚

辑者	佚书名	卷数	出处
清·马国翰	论语马氏训说	2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
民国·龙璋	马融注论语	1	小学搜佚下编补

八、郑玄《论语注》之辑佚

辑者	佚书名	卷数	出处
宋·王应麟	古文论语	2卷 附录1卷	碧琳琅馆丛书甲部
	论语郑氏注辑	2	芋园丛书·经部
清·王谟	论语注	1	汉魏遗书钞·经翼第四册
清·孔广林	论语注	10	通德遗书所见录
清·宋翔凤	论语郑注	10	浮溪精舍丛书
			食旧堂丛书
清·臧庸	论语郑注 ^[1]		
清·袁钧	论语注	10	郑氏佚书
清·马国翰	论语郑氏注 ^[2]	10	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
			郑学汇函
清·王仁俊	论语郑注	1	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经编论语孟子类
	论语郑氏注	1	十三经汉注
清·黄奭	论语注	1	汉学堂丛书·高密遗书
			黄氏逸书考·通德堂经解
清·劳格	论语郑注		月河精舍丛钞·读书杂识卷二、卷六
清·俞樾	论语郑义 ^[3]	1	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
			皇清经解续编
民国·龙璋	郑注论语	1	小学搜佚下编补

[1] 此书作者未见。宋翔凤在《论语郑注序》中言其辑《论语郑注》与臧庸“同时用力，后见臧本，善其精审，惜一见之后遂密不出”。潘维城辑《论语古注集笺》时曾求得臧庸郑注辑本，汇订而存之。

[2] 马国翰此辑，乃是据陈鱣《论语古训》所辑郑注录出。

[3] 俞樾此辑，专采郑玄《诗》笺及三《礼》注中涉及《论语》之文，间下按语，虽非《论语注》，然皆郑玄说《论语》之义者，可补诸家《论语注》辑本所缺。

九、何休《论语注训》之辑佚

辑者	佚书名	卷数	出处
清·刘逢禄	论语述何 ^[1]	2	皇清经解
			蛰云雷斋丛书
清·刘恭冕	何休注训论语述	1	皇清经解续编
			郧斋丛书
清·俞樾	何劭公论语义	1	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
清·王仁俊	论语何注 ^[2]	1	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经编论语孟子类
		1	十三经汉注
民国·龙璋	何注论语	1	小学搜佚下编补

十、麻达《论语注》之辑佚

前已述及，麻达注《论语》，见《广韵》引《风俗通》，此外别无著录。王仁俊辑《论语麻达注》一卷，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经编论语孟子类》。王仁俊此辑，仅有小序，未有辑文。小序全录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之说。

[1]刘逢禄拾遗补缺成《论语述何》一卷，其实不过是以《春秋》说《论语》，而于何注无征也。

[2]王仁俊从《北堂书钞》、慧琳《一切经音义》各采得一节。《北堂书钞》一节不可信，第三章第一节已证明。

参考文献

- [1]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刘宋范曄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5]唐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6]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本,1999.
- [8]魏何晏等注,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 [9]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0]钱穆.《论语要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 [11]杨树达.《论语疏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 [1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13]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14]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本,1999.
- [15]张涛注译.《孔子家语注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16]汉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7]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8]汉韩婴著,许维校释.《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9]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0]汉杨雄撰,韩敬注.《法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本,1999.
- [22]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3]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4]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5]汉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26]黄晖校释.《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7]北魏酈道元.《水经注》[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 [28]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9]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30]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本,1999.
- [31]唐柳宗元.《柳宗元集》[Z].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2]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33]宋洪适.《隶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4]宋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5]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6]清朱彝尊.《经义考》[M].上海: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本.
- [37]清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Z].上海:上海书店,1988.
- [38]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39]清惠栋.《九经古义》[M].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刻本.
- [40]清余萧客.《古经解诂》[M].清刻本.
- [41]清陈鱣.《论语古训》[M].清光绪九年(1883年)浙江书局刻本.
- [42]清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M].清光绪七年(1881年)江苏书局刻本.
- [43]清·俞樾.《春在堂全书》[M].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 [44]清王谟.《汉魏遗书钞》[M].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刻本.
- [45]清孔广林.《通德遗书所见录》[M].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刻本.
- [46]清汪大均.《食旧堂丛书》[Z].中国书店1985年刷印本.
- [47]清袁钧.《郑氏佚书》[M].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刻本.
- [48]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M].扬州:广陵书社,2004.
- [49]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目耕贴·续补经编论语类》[M].清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
- [50]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51]清黄奭.《汉学堂丛书》[M].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刻本.
- [52]清阮元.《皇清经解》[Z].上海:上海书店:1988.
- [53]清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Z].上海:上海书店:1988.
- [54]清丁宝书.《月河精舍丛钞》[Z].清光绪六年(1880年)刻本.
- [55]清崔述撰,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56]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57]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8]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C].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1931).
- [59]陈梦家.《尚书通论》[M].商务印书馆,1957.
- [60]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辑.《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G].北京:中华书局,1955.
- [61]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M].北京:三联书店,1986.
- [62]钟肇鹏.《谶纬论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 [63]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64]单成彬.《论语源流考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 [65]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66]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Z].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67]李学勤.《定县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C].《简帛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257—265.
- [68]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性质新探》[C].《简帛研究》第三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459—470.
- [69]中国哲学编辑部,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合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 [70]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Z].北京:中华书局,1993.

- [71]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7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J].《考古》,1972(2):51—53.
- [7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校勘记》[J].《考古》,1972(2):54—67.
- [74]文物出版社.《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J].《文物》,1972(2),13—15.
- [75]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J].《文物》,1981(8).
- [76]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J].《孔子研究》,1987(3):94—99,126.
- [77]郭沂.《〈论语〉源流再考察》[J].《孔子研究》,1990(4):32—40.
- [78]蔡彦仁.《从宗教历史学看口述〈论语〉的传承与特征》[J].《世界宗教研究》,1994(3):41—51.
- [79]郭沂.《再论原本〈论语〉及其在西汉以前的流传》[J].《中国哲学史》,1996(4):38—47.
- [80]湖北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J].《文物》,1997(7):47.
- [81]谢凌.《熹平石经——中国第一部官定经本》[J].《四川文物》,1999(2):35—38.
- [82]单成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J].《孔子研究》,2002(2):29—38,124.
- [83]贾庆超.《曾子领纂〈论语〉说》[J].《东岳论丛》,2003(1):87—88,129.
- [84]陈东.《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J].《孔子研究》,2003(2):4—13.
- [85]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J].《中国哲学史》,2003(3):32—39.
- [86]梁涛.《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J].《管子学刊》,2005(1):98—102.
- [87]田春来.《汉代〈论语〉的流传与演变》[D].中国优秀硕博论文,2005.

后 记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转眼间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回首过去，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让我“痛并快乐着”。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世，这将让我受益终生，在这里我向所有老师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从研二上学期开始进行论文题目的选择直到面前完成的打印成稿，细细数来，已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我的论文从定题到完成无不浸透着导师曹书杰教授的心血，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先生真诚地说一句：谢谢！能来到东北师范大学并投于曹书杰教授门下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先生的知识博大精深，先生的风采儒雅睿智，先生的为人刚正不阿。先生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我，真无愧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这三年中，先生在思想、学习、生活多方面都给了我很多的关怀，可以说，我的进一步成长与成熟是和先生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在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也得到了李德山老师、黄云鹤老师、刘奉文老师、姜学峰老师、王彩云老师、闫丽老师、已毕业的师兄师姐、古籍所所有老师和同学以及同寝人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将是我不久的精神支柱，在这里我向大家表达深深的谢意，并诚挚地祝愿所有老师、同学健康到永远，快乐每一天！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虽然投入了大量精力，但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加上相关资料收集的困难，论文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同时，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文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老师指正。

和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老师指正。

蒋焕芹

2005年5月